

炎黃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我參加「二二·九」運動的經歷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抗爭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黨對地富及其子女政策的變遷

評諸葛亮用人與魏延之悲劇

第12期

炎黃春秋杂志社出版

总第105期

沉痛悼念胡绳同志



▲ 2000年5月29日摄于福建漳州市人民广场。这是胡绳同志亲属向我们提供的胡绳最后的照片之一



▲ 1990年2月江泽民、邓小平等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右侧第一人为胡绳）



▲ 1998年1月，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为胡绳80寿辰举行宴会，胡绳与夫人吴全衡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切交谈



▲ 1998年1月11日，胡绳与龚育之（左，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惠（右，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亲切交谈

胡绳同志走了！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用他那如椽的大笔，写下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影响重大的作品。1998年，他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进一步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扬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论点出发，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胡绳同志晚年对邓小平理论的阐述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勇于纠正自己的失误。他一生的著述，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绳同志是本刊顾问。他的高尚品德和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治学风格及他对本刊的支持，为我们办好杂志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并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



▲ 1974年胡绳同志全家合影



▲ 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右起：郑必坚、雷洁琼、李铁映、李瑞环、胡绳、任继愈）

炎黄春秋

亲历记

- 2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
——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五周年 柯华
6 哀悼胡绳 李普
8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李小安

春秋笔

- 14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 闻集
20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表二十周年 余广人
28 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冯建辉
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战火中诞生 杨兆麟

求实篇

- 40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严纪青
45 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秦维宪

古镜台

- 49 古往今来名利观 官伟勋
54 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徐澄清

文荟苑

- 59 文化奇人张伯驹 王晓飞
65 中共党史人物丛书的来历 李传根

轶闻录

- 68 冯玉祥扫贪碑的曲折经历 翟智高

赤子心

- 70 五十年后重访志愿军战俘营 张泽石

陨星篇

- 72 忆访李大钊故居 林田

群言堂

- 48 新“酒令” 杜导正

编读窗

- 75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 汪京
77 2000年总目录 本刊编辑部

顾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绳
陈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庄 李普 李锐
李学勤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青
戴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宋文茂(常务)
徐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思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外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3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

——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五周年

□ 柯 华

1935年12月9日晨，天未亮，严寒，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在向北平城里进发的路上，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也许现在人们很难想像我们当时激奋的心情，这不是一般的呼喊口号，这是全北平学生的怒吼，是全国人民的怒吼。这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北平学生都热泪盈眶，把积压在心头多时的激情像火山爆发一样放声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即像烈火燎原，在全国声势浩大地蔓延开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重要的篇章。

毛泽东主席对“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又攻占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突破长城上各个口子，华北门户大开，日本侵略者随时可以攻占平津。

1935年6月，日寇以武力威胁我国华北地区，当时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旨意，与日军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定了“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沦丧。

1935年8月，日寇促使国民党和汉奸又

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积极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统治华北的傀儡政权，企图把华北建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於通县成立冀东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直逼北平城郊。

在华北五省人民即将像东北一样沦为亡国奴的时刻，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其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主义”的对外投降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对内政策，并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实行坚决镇压。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党的“八一宣言”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政治领导，红军北上胜利大大鼓舞了进步青年。后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坐镇北平，北平的地下党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对“一二·九”运动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1936年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二·九”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完全赞同“一二·九”的政治口号，并从北平调了一批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运动领袖到西安张学良的部队工作。西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在推动张、杨将军发动“双十二”事

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双十二”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以失败告终，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下面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准备了“七七”抗战”。这里，毛主席所讲的“准备”当然是指全面的准备，也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群众运动上……等等的全面准备，我想也包括干部队伍的准备。“一二·九”运动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很多人都成了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以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燕大“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黄华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九”运动对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人生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之后，北平进步学生很快就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平汉铁路沿线的农村，向农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这对培养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群众观点是个极重要的开端。宣传团被反动军警押解回北平后立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此，党通过“民先”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了大量的活动，使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受到深刻的锻炼。当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战时，我和几个同学参加陈波儿、崔嵬的剧团到归绥（今称呼和浩特）、百灵庙慰劳抗日战士；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我和两位男同学和三位女同学装扮成三对情人去通县“侦察”敌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参加燕大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率领的抗日战士；7月28日，日军进占北平，是日清晨，我奉命在日军进占南苑机场之前先去拍南苑的照片。我从南苑这边大门进去，拍完照，看到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军已从另一大门进机场，我急速骑自行车从原来的大门飞奔回校。

在这之前，民先队还组织了话剧团在郊区演出，并组织歌咏队、社会调查、集体早操、野外宿营、打雪球战等适合团结更广大青年的活动，锻炼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少部分人还在党的领导下深夜秘密在校内散发和张贴传单。在1936年“三·三一”抬棺游行后，学生运动进入暂时低潮时，社联积极组织领导读书小组，大家都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我个人还专心钻在图书馆里硬“啃”完英文版的《资本论》，读了两遍。正是在这些锻炼和学习中，大家的革命意识逐渐增强。后来又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影响，看了他的《西行漫记》，听了他介绍红军的讲话，看了他从延安拍回来的纪录片，还得知了许多红军胜利的消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我们的革命意识。到1937年4月燕大地下党提出组织参观团去延安时，立即有多人报名参加，但考虑到人数太多，容易引起反动军警的觉察，因此参观团共只十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了混过国民党的耳目，我们都打扮成公子、小姐的模样，打的旗帜是“燕京大学学生旅行团”，到了延安，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从白区来的学生参观团，又是在“一二·九”运动以后

来访问的，因此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同志当时去西安和国民党谈判外，几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接见了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对我们的教育很大。许多红军将领也接见了我们，或专程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望，同我们进行亲切无间的谈话，讲故事，讲打仗，讲长征等等，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他们也热切想知道“一二·九”运动和白区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里要特别讲到毛主席两次接见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观团到达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就在他的窑洞里接见我们，一直谈到晚上八、九点。毛主席一开口就说，苏区一直还没有从白区来过学生访问团，他热烈欢迎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访问团来参观。大家都觉得毛主席的话不是一般的客套话，而是真诚恳切的欢迎和嘱咐。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谈了他对“一二·九”运动的重要评价，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他并问了一些北平新学联和旧学联的对立情况，但他没有多问华北政治、军事的情况，看来他对这些情况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也了解得很透彻。他对日本在华北的军力和摆布都讲得很清楚，就像给我们讲故事或者像老师讲课一样，连讲不停。

我们向毛主席提出几个问题：抗日战争能打得起来吗？怎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能否实现？那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怎样能和它联合起来呢？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毛主席详细讲了游击战、持久战，使我们茅塞顿开。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一天没有谈，他说过几天，将在一个延安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让我们参加这个大会。过了几天，给参观团发来去参加活动分子会议的十张票。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问题的报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和前三天接见时的讲话，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答，大家对形势的认识大大提高，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大大增强。我们对延安几天的访问

收获很大，而毛主席的谈话和报告是我们这次参观访问延安最大的收获。

在离开延安的前夕，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毛主席亲切嘱咐我们：“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兴地回去，我们对于北平的学生抱着极大希望，北平是国家的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的国际形势看来，日本不久就要进攻中国，希望你们能做全国人民的表率。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是坚定的，共产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毛主席的话多么亲切，真是诲人不倦啊。

遗憾的是，当我们要求和毛主席合影留念时，他没有同意。他解释说，你们还要回到北平，和我合影，万一被国民党查出了，对你们很不利，甚至是很危险的啊。

燕大学生参观团回到北平后，我们就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林老的谈话以及延安各界真情待人，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民主活跃，生动活泼，歌声四起的充满活力的气氛在进步同学中，甚至有时在公开场合广为宣传。不久后，燕大又组织第二个参观团去延安，其中也有我介绍的两个外校的同乡学生。

“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锻炼了我们。参加救亡运动的许多青年学生都在后来到解放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抱着民族仇、报国志的激情弃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前线。

现在“一二·九”奋斗的目标已经胜利达成。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打倒。其他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也已被肃清。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为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祖国而阔步前进，我国已经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人民生活还不够富裕，我国前进的道路还任重道远。

(1) “和平与发展”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但是美国的顽固派仍疯狂反华。霸权主义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在跃跃欲起，他们的影响和力量也不可小视。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现在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较薄弱。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代,每逢“国耻”日,都举行专题报告、演讲会、演出、出壁报、甚至游行……等热烈纪念的活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老人对每件国耻大事都还能清楚记得,烙印在心。而现在的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血斑史究竟知道多少,值得大家深思,采取切实可行办法,选定几个主要的国耻日有声有色、扎扎实实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现在人才外流问题虽已引起领导方面的注意,但基础工作还是必须从加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着手。现在通过考试招聘一些相当高级的干部,其条件有些地方只是强调文化程度和职业才能,这两条无疑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学识是不可能担负起复杂的经济领导工作的。但是光有上述两个条件,我们选择干部的标准,就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了。选择干部的标准在注重“才”时,仍应强调“德”字。讲“德”,主要内容起码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才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求的只是“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要求其一定要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信仰自由问题,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但作为国家干部爱国与否是不能选择的。当然,爱国与否是不能光靠一次考试的答卷就能了解,而是要通过平时并在招聘工作后进行经常的考察和教育的。

(2)群众观点问题:有史以来,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也出现一些为群众谋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的令人尊敬、名扬千古的伟人,但就其整个阶级而言,他们总是与人民群众对立,剥削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我们的革命是靠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忘记群众,就是忘本。

我们选拔干部,还必须考察其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不管其文化多高,才能多大,都不可能是好干部,甚至会做出坏事的。

群众观点的核心是为群众服务。这就首先

要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领导和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查工作。而现在不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很少,很少。即使有时一些人似乎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到群众中去了,实际上也只是表面文章,心不在焉,什么问题也没了解,更谈不上解决,更糟糕的是甚至借机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影响极坏。

现在群众意见最大的当然是腐败问题。贪污腐化问题,中央已经讲了很多,只要坚决认真大力贯彻就是了。讲了十几年的干部子弟问题,最近中央又有重要指示,朱总司令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榜样,各级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按此去做,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的。群众对浪费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对贪污受贿的愤怒,浪费是犯罪,这是我们党早就严正提出的问题。但是大吃大喝全国一年浪费吃掉上千亿,迄今还是屡禁不止。而比起吃喝更大的浪费有的是,一任官职,必要修建一座什么豪华阔气的办公大楼、宾馆、纪念性的雄伟建筑物……以显示自己在任的政绩,名存千古。总统套间几乎成了一些中等城市政府迎宾馆必有的建设。但实际上几乎完全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到这些总统套间住宿,即使外来的富豪,也很少对此问津,结果多是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住了,反正房子空着,不住也是浪费,但你住了,就脱离了群众,就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在城市建设中这类不必要的或者可以缓建的“超前”建筑似乎越来越多,现在城市人民的住房问题还很严重,很多家庭仍然拥挤不堪,我们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有些庆祝活动,花钱太多,外国人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是傻瓜,才这样花钱,对此大家意见很多,不应不引起重视。

我们的财政收入是哪里来的,不就是税收来的吗?税收就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浪费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还有几千万的下岗职工,有几千万的人民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国家还不够强大,急需的建设项目还很多,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多多考虑这些问题吗?

(责任编辑 师文)

悼胡绳

□ 李普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我是先熟识他的夫人吴全衡才同他熟起来的。1940年我到新华日报当记者，她已经先在了，记者就我们两个人，我叫她小吴，他叫我小李，从此逐渐成了好朋友。1980年前后有一次在人大会堂碰到了，两个老人依然小李小吴地叫，惹得旁边的几位老人大笑起来。

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总督投降。他们是皖南事变以后去香港的，在那里结了婚，这次脱险回到重庆。胡绳也进了新华日报，主编副刊同时当研究室主任。他在学术界进步人士中很有声望。1944年我身体垮了，不能再熬夜，从夜班编辑部转到研究室，成了胡绳的部下。“部下”这个词是事实，但是在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个词似乎不大很贴切，因为大家觉得彼此都是共产党员，是平等的，只是各有各的分工，很亲密，不强调什么上下级。我的任务是两项：写一个向大后方的读者介绍解放区的专栏，每月三四篇；编一个介绍解放区的专刊，每周一期。

解放区原先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进军日寇后方开辟起来的。抗日推动了民主，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抗日，在万般困难中取得胜利。抗日与民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写那个专栏《解放区漫谈》，就是用具体的事例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道理。后来我进一步论证，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环境中生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的，是逐步清除自己身

上的封建专制流毒而成长壮大的。

写这个专栏，后来我屡屡回想，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这就要感谢老胡了。他与我同年，确实比我高明，我很钦佩他。那时我没有到过解放区，只能靠阅读解放区的报纸和极少量的书刊。当我从阅读中逐渐接近了一个主题，再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再三思索之后，似乎明确了又似乎还没抓住，我就去找老胡。办公室狭小而又拥挤，不可能详细谈，我就在下班以后往他家里跑。所谓家，也不过是小小的一间房罢了，那时候他们的长子伊朗已经出生，也挤在那间小房里。好在我同小吴是好朋友，他们夫妇俩都不会讨厌我。我首先简单说明来意，然后详细讲故事，就是详细讲我已经掌握的材料，最后讲我的打算，打算拿这些材料说明什么观点，也就是怎样立意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写。我提出两个或者三个想法来，请他帮我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清楚的是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没有到过解放区，多次说讲的这些是他闻所未闻的，有些问题是不曾想到过的。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有时候从我的两三个想法中肯定一个，有时候另外提出他的意见。不论哪一种情况，哪怕是肯定我的想法并且完全顺着我的思路，我觉得他也往往比我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这种谈话或者讨论无拘无束、兴味盎然，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写这些文章成了我的一件乐事。这种讨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当我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这种心情就冲口而出，成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这样悲伤，慎之在电话里也感觉到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绳比我先去上海。他10月份接到通知，我赶紧把那些文章挑选了一番，编成一本小书，命名为《光荣归于民主》，请他带去出版。这本小书年底以前就在上海出版了，据说大受欢迎，在上海和京津等地很走俏。东北解放得比较早，东北书店把它

翻印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中外出版社”秘密出售，卖出了上千本。由于出售包括我这本小书在内的进步书籍，这个出版社有五位地下勇士坐了国民党半年牢。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害怕民主，不允许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只能由他的军队片面抗战，从而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很快便变为消极抗战，因此更加引起人民的愤恨。他便更加害怕人民，更加害怕民主，更加加紧专制独裁。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把这一套带到刚刚收复的地区，立即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解放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她民主抗日的实践对国统区的读者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把这本小书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重新出版，重新编排了次序。后来老友王若水对这本书表示赞许，说它对研究民主问题有用处。我说书名改坏了，依然叫《光荣归于民主》就好了；他说那倒也不要紧。前年我看到他夫人冯媛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的材料好像引自我那本小书，不论是不是，她那篇文章又一次把我引入了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胡绳同乔冠华是好朋友。有一个傍晚在我们研究室门口的走廊上谈天，乔冠华说他不能离开老胡。在朋友们闲谈中发生争论的时候，若没有老胡在场同他站在一起，他往往吃憋，被人家抓住小辫子。如果有老胡在，周密论述，化解他的小辫子，他们一定赢。我认为这两句话是一幅逼真的速写，寥寥几笔把这两位大才子的特点勾画出来了。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短处，两者同时存在，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乔冠华才华横溢、豪气干云，有时候暴露出那硬币的另一面来就是失之于疏狂。胡绳呢，他思虑周详、逻辑严密，另一面就是失之于拘谨了。这是我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了吧。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同他夫妇俩常有接触。后来我去了广东，十三年中很少相见。文革以后重逢，他给我看他的两首绝句，是临时用铅笔在一小块破纸片上写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会写格律诗，而且精于此道。以后几年中我看了他一些文章，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这使我渐渐产生了一种惋惜的心情。我没有资格在学术上对他作出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十分钦佩他和感谢他的朋友，这种惋惜的心情越来越深。八十年代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会，碰到了，我对他说：

“你是个学者，还是回书斋去做学问的好。”

他说：“我自己也这样想。又拉上我了，推不掉。”他说的又拉上他的是件什么事，现在记不起来了。

近几年我发现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经过认真反思的重大变化。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大文章，非常高兴。我由于写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前后”而回顾了毛泽东这一名著，读胡绳这篇文章就好像当年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又如坐春风，又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有一段话，加深了我这种感觉：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

胡绳觉醒了，重新站起来了，我感到十分庆幸。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这么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事实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

我打电话向几位朋友请教。有一位说，这几年胡绳确实解放了，在这几年之前，他明显地束缚太深。另一位说，他早年尊重实际、倡导民主，是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最近这几年又表现出这种气概来了。再一位说，我举个例子吧：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黎澍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

他那篇再评价《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受到某些人批评，我想早在他意料之中，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他无所顾忌。他经过长期的曲折，晚年重新显出这种精神来，我要说，这多么不容易，了不起！

我感到他既已回归自我，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当我同许多朋友一起这样期待的时候，他突然离去了，这使我更加深深悲痛！

2000年11月10日写完初稿，17日改定。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 李小安

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

有教无类乎

“镇反”时，父亲于1952年冬“落网”。那时我们全家都在湖北应城，父亲是一个石膏矿上的工程师。母亲后来说：父亲是CC分子。

迫于生计，1953年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千里迢迢回到老家投奔三伯。三伯是父亲的亲哥，那时父亲的父亲——我的爷还在。

土改时老家定为富农。前来求生的我们，却投到了“黑窝”里。

到老家那天，爷和三伯一家都拉长了脸。我和哥是一对双生儿，少不更事，傻呵呵地东看西瞧，忽见昏暗的屋里一个老太婆在一块木板上用手轻轻地揉着面团，一根两头尖尖的小木棒飞快地旋转着，像变戏法似的小小面团忽地成了一大片。我哥俩正看得入神，母亲过来说：“去，给你们的亲娘磕个头。”我感到万分奇怪，半路上怎么又多出个亲娘来？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老家还有个亲娘呀！就在我跪下磕头时竟意外地发现娘有一双小脚。

娘是父亲的“糟糠”。我喊了声娘又磕了个头，母亲算是有了“交待”。吃上了娘做的酸汤面叶，我们就多了个娘，也就多了个依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有了“双向认同”。日后，娘果真极专注地“拉扯”起来了，就像母鸡呵

护雏鸡那样，只是光讲奉献不计回报。

回到老家之后的热劲还未降温，三伯就给了根鞭子，冷冷地说：放牛吧。我从此成了小牛倌。我个子矮，比牛屁股高不了多少。但我知道了要想吃饭就必须去放牛。

从此，童性泯灭了。我不愿意与牛为伍，有时便望着这两头“哑巴”发恨，火气一上来就抽它两鞭子。

好在我和哥是对孪生，有了这优势，可以一天放牛一天上学，轮流“值班”。上学只需要一套课本，一个座位。娘喂了五只鸡，卖鸡蛋的钱要买煤油、盐、针头线脑。每逢新学期发书的时候，娘就拿出一分一角攒起来的钱，去买书买本。为了省钱，舍不得买作业本，一次娘拿七个鸡蛋卖了四角七分钱，向姨娘要了三分钱，买了一刀毛边纸，使我们哥俩如获至宝，用了正面用反面，惜纸惜字，整整用了一学期，只是老师直埋怨我们写的字太小。

这个黑窝里名副其实的“窝主”是我的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头稀疏枯槁般的衰发，两只手抖抖索索，是个干瘪老头。当年如何剥削农民，他当然不肯讲，我也没有听人讲过。至于他当年还有什么反动表现，我挖空心思只想起一件事：

一日，爷去地里干活，刚走出大门，天上飞机嗡嗡飞过，他头也不抬，也毫不回避地骂了一句：“妈×，俺的飞机。”他说这话时听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贫下中农。爷说“俺的”可能就是指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地方1947年就解放了，哪能飞到这里来？只能说明爷贼心不死，大白天说了一句梦话。大家并不以为忤，反而哄

笑起来,留下了一个“笑话”。至于我是否为此受到影响,坦诚地说根本没有。只是因其可笑,我才记住了。在我回到老家的第二年,爷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真正使我受到教育的,还是共产党。初小四年,我虽只上了两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奇迹般地考上了高小,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小在六里之外,叫李庄完小。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玻璃,深咖啡色的桌椅,比起趴了两年的木板课桌,土孩们挤在一起的情景,这里是到了“天堂”。在第一堂音乐课上,伴着脚踏风琴的旋律,我学的第一首歌是:

小鸟在前边带路,
风啊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自花园里,
来自草地上。
他们都说世界上,
有我们就更幸福,
他们都说世界上有我们就更幸福。
唱呀!唱呀!唱呀!
跳呀!跳呀!跳呀!
亲爱的领袖毛主席,
和我们一起,
过呀过那快乐的节日。

那是学英雄唱英雄的年代,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一串串珍珠般闪光发亮的名字激励着每一个同学。校园里生机勃勃,校风正,学风浓。老师尽心尽力,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迪。

1956年,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我们都入合作社了。我再也不给三伯放牛。母亲已在原阳县一个乡村教小学,月薪不高,生活倒能维持。苦的还是我们的娘,五更起来做饭,为了我们哥俩要早早吃了饭到六里外去上学。

我家是队里的缺粮户,放假就拼命挣工分弥补亏空。但苦和累并不妨碍我求知欲望和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我全身心地扑在这来之不易



土改时期河南省偃师县马洼乡的划分阶级大会会场

的学习机会上。课余时间,我浏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关于生命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我很想学业有成,报效祖国。

高小二年,飞逝一般。毕业考试后发下了毕业证书,我一看成绩表上竟全部是五分,来了个满堂红,我成了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时值1958年“大跃进”,教育也跃进,提出了要普及中学教育。考中学的试题很简单,20分钟我已把试题做完。时间之短,竟使监考老师告诫我说:“还是拿回去,再检查一遍!”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20天后我却收到了不被录取的通知:

李小安同学:

经校务会研究决定不予录取。

焦作九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哥也收到同样内容的一份，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黑色”的日子。

我哥俩抱头痛哭。娘为我们做了荷包蛋酸汤面叶，娘放下只有我们病了才得以吃到的饭，叹口气悄然退到一边，因病正休息在家的母亲，拉起妹妹找学校去讨“说法”。

在母亲得知我们的成绩均在95分以上时，母亲准确判断到我们落榜的原因后，反倒冷静下来，孩子们已经努力了，出身不好是孩子们不能改变的。

当了“下窑黑”

1970年春，公社开了个小煤窑，把下窑的指标一杆子就插到了生产队。我已在“广阔天地”干了多年，磨了一手老茧，在生产队能独挡一面，生产队长立刻就“号”上了我。

这一带煤矿多，都把去国营煤矿当工人叫下大井。下大井的煤矿工人工资高，吃商品粮，非“根正苗红”者莫属，连大姑娘择婿，煤矿工人都在选择之内。

同样是挖煤，小煤窑就差多了。旧社会把小煤窑的工人叫“下窑黑”。因安全设备差，常出事故，所以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有女不嫁窑黑郎，一年两头守空房，初一十五见一面，染个乌嘴黑胸膛。”

解放后的小煤窑，情况到底有所改善。生产队长正式通知我时，还点到一个“优厚”条件：那就是除了上一班由生产队记一个劳动日外，小煤窑每天补助入井费七角。

我去“赴任”了。这里条件果然差，没有高高的井架和机器的轰鸣声，只有碗口粗的钢管支起的三角架，顶端有个滑轮穿着拇指粗的钢丝绳。因为正在往上吊煤，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几个灰头黑脸的人在井口忙碌着。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班长。下井前，工人们都在更衣。

班长是个中年人，见了我很和善地点了点头，递给我一双短筒胶靴和一顶柳条安全帽，说了一句戏剧术语：你的行头。在这里我很快结识了一个叫“狗妞”的小伙伴。在我们乡下，

男孩多叫女孩名，冠以狗呀牛呀。据说名字起得“贱”了，反倒成人。因为连阎王爷都男尊女卑，因嫌弃便不派小鬼来勾了。

终于到了下井那一刻。班长分配我去拉“拖”。“拖”是拉煤工具，一米长的木架上拴一个长筐。木架下边安着四个烧饼大小的木轮。拉拖人身佩襻带拉拖把煤拉到井底，然后重新装筐上井。

拉拖并不好干，劲用小了丝纹不动，劲用大了就翻车，越急越手忙脚乱，几番折腾就大汗淋漓了。

狗妞悄然而至，见我这狼狈相，嘿嘿地笑起来。他也是个拉拖的，钩住拖，两只手扒住两边的断梁折柱，拖很听话地跟在屁股后。我埋怨班长第一天上班就分我干这个勾当，狗妞说这是班长照顾我，没有硬任务，拉多少算多少。这一班我拉了九拖。

半月后，班长提升我当了“老掘”，交给我一把掘斧，任务是负责更换那些断梁折柱。无疑这责任重大，危险也增加了，但我获得了某种信任感。

我当老掘的第三天，已完成了搁茬任务。快下班时，不由的弓腰跑到同班赵孩那里。他长我几岁，人很忠厚，常给我以指点。他正在回采，巷道西边已经采空，稀稀拉拉几根木柱顶住棚底，赵孩靠着一根木柱歇息，我望着顶棚已经呲牙咧嘴，说了一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赵孩咧嘴还笑了一下。

我返回原来的地方刚坐定，忽见一个拉拖的像兔一样从我身边蹿过，结结巴巴：“快……赵孩，灯……倒了。”我心里一惊，掂起掘斧就往外跑，这时所有的窑黑已经聚集在大巷里了，个个像霜打一样。

这是一次重大塌方事故，赵孩是大意失荆州，一盏灯真的倒了。

我亲眼目睹了几幕惨祸，回到家里就“罢工”歇了几天。哥哥见我没有上班的意思，只好冒名顶替。俩人一商议，干脆按月轮换，像小时放牛那样。

几个月过去了，倒也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在哥值班的一个月，一次他睡过了头，等我

干完活回来时还是个凉水锅，肚子饿得哇哇叫，拌了两句嘴，哥一赌气不上班了，也就是这一班发生了瓦斯爆炸！

自从听说瓦斯爆炸那一刻起，哥也开始罢工了。

我前边说过，因为我和哥是双胞胎，可以“鱼目混珠”，我下煤窑干累了，干泥瓦工的哥哥就能替换我几天，我也有了学泥瓦匠的机会，这正中了爷爷当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会跟，跟个木匠泥水匠；不会跟，跟个道士和尚。”爷是泥水匠出身，我也学起泥水匠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大模大样去小煤窑上班，暗地里拜师学艺，不显山不露水。

哥学了三个月正式出道，开始了走百家门吃百家饭，吃在外边省在家，挣了钱自己花。我将步其后尘。

一次荒唐相亲

联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俗话说：官找官，宦找宦，庄稼人找个背扁担。我兄妹四人，在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婚姻也受到影响。大哥只好入赘，当了上门女婿，小妹远嫁高攀去了。我哥俩则留在老家困守愁城，亲戚也爱莫能助，婚姻大事被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

记得妹妹出嫁时，村上的“老见识”背地就曾点化我，给她换亲。妹妹有个小姑，年纪相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换亲这一说，感到很奇怪，亲怎么能换呢？大概是这个“老见识”已预感到我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才出如此下策吧。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真还被他言中了。

后来哥当了泥水匠，掂起瓦刀云游四方，在这一带已小有点名气。一次去盖房，盖房子的主人家有一女尚未出嫁，哥从开始盖房之日便与其女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情意绵绵，相见恨晚。谁知房子盖成之日即为分手之时，这一家就是拿女儿去换亲了，给她哥换回个媳妇传宗接代！

换亲也是无奈之举，谁有头发会去装秃呢？这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有人给我说过宽心话：有苗不愁长，有这

灰滩不愁驴打滚。机会终于来了。

1972年腊月的一天，妹妹打发她的小叔来通知我：有紧要事相商。我赶到妹妹家才知道是婚姻大事。从妹妹嘴里得知：她婆家有一老亲戚是个右派分子，膝下一子老大不小也是尚未婚配，最近一个时期经常往长垣县那边跑，那边很穷，有女愿意嫁过来，不讲成分，何不跟上去摸一摸？

我一听这个“摸”字心里就凉了半截，说个媳妇是有的放矢，去摸媳妇就是望空扑影！况且长垣县距此地少说也有二百里，人地两生，哪有现成的媳妇叫你摸？

经不住妹妹再三督促，我才不情愿地到她老亲戚家里见到了“船”（船可以把我送到爱情的彼岸，故戏称之）。

长垣是个穷地方，人穷志短，有的人家就把女儿当摇钱树，吸引心急火燎的光棍上钩。大米白面源源不绝送上门，到最后人财两空，大有人在。也有的人家为女儿计，只要能跳出穷坑，衣食无虞就行。

“船”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失败和成功相伴，何去何从自己决断。

我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向哥作了汇报，哥一听就摇头。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日不办，更待何时？商量到最后，决定由我代兄相亲。

我与“船”商定了日期，1972年腊月二十一动身，这天我把过年的新衣穿上了，背上大米装好钱，与“船”一道踏上征程。其间跨五县二市，还要坐小火车。到了长垣县城，只觉得一个县城其实就是一个大村庄，出了县城，所到之处不见麦垅，只是白茫茫一片盐碱地，像下了一层小雪。

“船”路熟门熟，傍晚把我带到一个小村的一户人家。“船”告诉我：这是赵队长的家，“船”与赵队长稔熟，一见面就到一边嘀咕去了。我进屋后没人让坐，四下环顾，家徒四壁，竟无一桌一椅。门的一侧用高粱秆围个圈，里边装着大半圈白花花的红薯干。那边灶房里风箱呼打呼打地响着。没有煤火，屋里像冰窖一样。一家老小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补着花

花绿绿的补丁，还露出了棉絮。我们已经够穷了，这里更穷！生产队长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船”进屋告诉我：“茬”不现成。好在我早有精神准备。有意思的是这地方也把说媳妇说成“茬”，这叫法与我家乡一样。

“船”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从包里拿出两瓶焦作大曲放到桌上，“船”说：“赵队长，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条路还要常来常往，喝酒喝酒。”赵队长一听说喝酒，精神为之一振，赶忙吩咐炒了白菜，席地坐砖，一人一黑瓷粗碗喝起来。

我早有所闻，此地酒风甚盛，越穷越喝，背上二升红高粱也要换五分钱一两的红薯干酒。这里无酒不成事，喜酒之人喷起酒话，要个星星都敢应允。

果然，赵队长酒过三巡，拍胸打肚：明天就给“摸”个“茬”！我知道这是一句酒话，不敢全信，但也不可不信，人总是往好的方面想。

第二天，赵队长果真借酒力余劲“摸”茬去了。下午，赵队长乐颠颠地回来，他说有个“茬”是老俩口的“晚瓜女”，刚从县里学裁缝回来就叫我给摸住了，算你七字不好八字好。

我急忙问：“会不会做饭？”也许我的标准也太低了，赵队长竟不屑一顾，还颇不耐烦地说：“那是手到擒拿的事。”

这首要一条没有问题，我也就放心大半。对方还学过裁缝，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哥一定满意。

赵队长又说：“我把你的事摊开了，是一对双生儿，大的在家忙，弟代哥来，俩人的长相差不多，见到弟就见到了哥了。停一会‘茬’要来相一下。”

说是停一会，一直等到天全黑。黑灯瞎火连个灯也没有，“茬”真地来了。赵队长赶紧划了一根火柴吸着了烟，在那一刹间，我见“茬”瞟了一眼。还没有等我看清，火柴熄灭了。

“茬”低低与赵队长嘀咕了几句，倏地走了。

赵队长说：“这事八九不离十了。‘茬’刚才说，如果就是这模样，定了”。

成了，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形势发展之快

出乎我意料之外，以至于真成事了，我还恍惚如在梦中一样。

当晚我随赵队长回访了“茬”家。没有再见到“茬”，只见到了二老。悉数将三十元钱、二十斤大米奉上权作见面礼。我还与哥的未来泰山说了些礼物菲薄不成敬意之类的客套话，彼此客客气气。没有“钩鱼”之嫌，坦诚相待，明明白白。殊不知就在这明明白白中，不知不觉地就叫套住了。

赵队长作了最后陈述：过年“破五”我带辆卡车要一车煤。“茬”她娘也去，没啥问题赶快办，防止夜长梦多。

赵队长是要煤，哥是要人，两家两便。我慷慨应允后还追加了一句：到时候喝焦作大曲。赵队长眼都眯成了一道缝：那酒好喝。

赵队长没有食言，破五这一天带着解放大卡车来拉煤，顺便把“茬”娘也捎带上了。“茬”娘一见到我哥俩就笑了：“噫，俩人长得一样，过了十五六去领人吧。”

正月十九，哥赴长垣领人已经三天。这天



作者近照

下午我正在床上迷糊，忽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哥！他黑丧着脸，用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

“你咋相的？”声音虽低却疾言厉色。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茬”已款款进屋，我一看那模样顿时傻了眼，坏事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张貌似黑猩猩的脸，脸上满是松弛的皱纹，还有墨啄上的黑点！怎么……怎么会是这等模样！

捆绑不成夫妻。之后，哥一直怏怏不悦，新婚之喜即成了新婚之气。心里有块疙瘩梗着，终于由小打小闹演变成反目为仇。

“茬”一气之下扬长而去，一段短暂的婚姻，不，应该说是一场闹剧遂告终结。哥巴不得如此结局，如释重负，直想跪下磕头！虽“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在所不惜了。

一切又复归平常之后，心静下来了。我哥俩眼对眼，相视良久，扑哧一声都笑了。笑中带着苦涩，也有一丝的无奈。

一点余波

“文革”前，我曾看过一本小人书，书名叫《鸳鸯剑》，讲的是一堕民的遭遇。因其先辈曾在前朝为官入相，其后代被贬称堕民，只能作一些抬花轿，吹鼓手，掩埋死人之类的贱活。有一堕民不甘心於此，隐瞒出身，应举入仕，后因事情败露，夫妻双双自刎於鸳鸯剑下。故事写得颇悲壮，看后觉得与本人的命运极相似，但何谓堕民？不知其详。直到十几年之后查阅辞海，才在“堕民”条目下找到了答案。

原来，元朝时江浙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平民，即称堕民。元灭宋后，将俘虏和罪犯集中于绍兴等地，称之为“怯邻户”。后人称之为“堕民”。明编户典，统列为丐户，长期视之为“贱民”，世充贱役，不许与平民通婚，应科举。清雍正时改变其户口，称其良民。

这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

故事写到这里，还有点余波，并不轻松。

1979年1月28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我在村上拜完年回到家里，忽然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

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员，他们个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升学、招工、参军、入党和分配工作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的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出身。”

党中央说的何等好啊！我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我哥俩喜极而泣！这不是要取消成分吗？看来娶媳妇是有望了。

哥后来当了一个建筑队的工头，手下当小工的“美女如云”。他给我谈起这些事来如数家珍。其中提到一个山东籍姑娘，征求我的看法，我也觉得此女的条件与哥般配，对哥说：“重点进攻山东”！后来他果然“进攻山东”成功！我呢，也是后来进城后才解决了婚姻大事，这是后话。

正月末，中央文件来了，公社派员先开了个打招呼会，征求一下贫下中农的意见，走一下过场。

我亲历打招呼会。当公社干部征求意见，谁同意取消成分谁举手时，竟无一人举手，有位贫下中农甚至说：“那咋能取消成分”！中央都定了，他还坚持己见，着实让我的心凉了一下。

第二天在同样的地点，公社干部正式宣读了中央文件。也就是这一天正式取消了成分，血统论也随之成了历史垃圾。我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是进步！

我从会场走出来，第一次直起了腰杆，沐浴在阳光下，忽然觉得阳光是那样的灿烂！还有蓝天、白云……昔日已逝，来日可追！

（责任编辑 吴思）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

□ 闻 集

编者按：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隆重地召开了极高规格的纪念座谈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本刊特地从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写的《张闻天年谱》中摘编了这篇文章，以寄托我们对张闻天同志的崇敬之情。

这篇文章记叙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其中的是是非非早有定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一点其实正是张闻天在四十年前明确指出过的。张闻天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磊落襟怀，至今仍光彩照人，令后人仰慕。

1959年6月30日 离京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乘坐同一节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7月1日下午到达武汉，改乘“江新”号轮顺流东下，从九江转往庐山。

7月2日 抵达庐山，住东谷河东路177号。

7月2日—8月16日 在庐山参加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16日）。

7月2日—16日 被编入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会议初期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左”

的错误的议题，曾在小组会发言说：大跃进也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会议初期，还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一书。其间曾结合“大跃进”实际，向身边秘书发表过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等见解。还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月3日 将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5日批：“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7月10日 在华北组小组会上作国际形势系统发言。

7月10日前后 让秘书起草致毛泽东的信，并拟出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大体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要求写得具体一些，以便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信稿写成后因认为太空洞而未发出。

7月12日 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 与彭德怀在饭前饭后还有过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是做个大报告，实际等于是空的。

7月14日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此前张闻天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有听完便走了。

7月16日 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提出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在此前后，一面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还对王任重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示态度。一面于17日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称现在是反冒进，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子。会议中则围绕对彭信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反响与紧张气氛。相当一部分人同意彭信的观点，肯定彭的精神，

不少人对彭信提出质疑。少数人认为信是“针对主席”的，信中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说的“路线错误”，也就是要“更换领导”。

7月17日—8月1日 被编入第二组，通称华东组，参加小组会议。组长柯庆施。

7月18日前后 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 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住处小坐，同时相遇的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均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应该是在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7月中、下旬，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一起（有时同其中的几位）还有若干次接触或共同散步。

同日 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除认为会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及党内应该造成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的相同看法外，还表示不同意小组会中那种认为造成“大跃进”缺点的原因只是缺乏经验，根本不说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一类发言。还明确主张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周小舟对最后一点表示不同意。

7月下旬某日 约戎子和来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四十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四十亿元，而在于九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 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下午 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

(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就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除华东组的记录外，张闻天还让自己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同日 发言结束后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晚饭后见到彭



庐山会议期间的张闻天

德怀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将张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同日 庐山会议简报(二十)刊出张闻天7月21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7月24日 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的华东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

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这篇发言以《在庐山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四）。

7月24日或25日 遇到彭德怀。交谈中说，不能讨论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7月24日前后 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发言记录印发出来只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又求见刘少奇，当面向刘表示希望不要印发记录。刘少奇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最终还是在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

7月26日 在小组会发言说：参加庐山会议前，对成绩没有怀疑，但认为问题和缺点也不少，希望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弄清楚。参加会议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当时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

同日 毛泽东写《对于一封信^①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

含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随即骤然升级。

7月31日、8月1日 毛泽东在庐山住处“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张闻天未被允许参加，但毛泽东的谈话中说：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8月2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说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还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同日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印发^②。信中指责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讥讽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对此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③倒还差不多。”又反问：“怎么说‘尽是假的’？”

同日 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 交出书面检讨。同时给毛泽东写信，除违心地表示接受批评外，也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

8月3日—10日 参加华东组和第二联组（约于7月7日编成）的会议，接受批判斗争和追问，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

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月9日 在小组会上受到猛烈斗争和追查。会后心情沉重，驱车前往牯岭镇外山中，眺望远方良久，回头对身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

8月11日 毛泽东在全会大会上讲话，认定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张闻天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8月12日 准备在全会大会上作检讨。当写到在民主问题上的“错误”时，边写边对秘书说：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8月13日 被迫在全会大会上检讨，承认犯了“反党的右倾路线错误”，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彭德怀的信是“这条错误路线的纲领性的文件”，表示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保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检讨发言后，受到追问“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坦率承认这句话是在同彭德怀谈话中讲的，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

8月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者指责“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在庐

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宣布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但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8月17日 读到毛泽东所写《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其中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

8月18日 离开庐山返回北京。行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还说：“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8月20日 回到北京。夫人刘英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了！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讲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他问刘英：“你看我讲的哪点不是实情？”并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

8月24日 周恩来在公安部礼堂向外交部党委委员和归国大使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同日陈毅主持召开的外事系统批斗张闻天大会（通称外事会议）开始。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内容根据统一布置集中在所谓“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两个问题上面。

8月25日、9月15日 国务院第九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国务院任命的各项人员名单中均无张闻天。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被解除。

8月28日 写出《我的检讨》(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其中说,在庐山同彭德怀交谈中曾说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不易提不同意见,不民主。”两人都说过毛泽东“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不够,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8月29日 在参加批斗会回到家中对刘英谈了自己早年的历史,并说:“我的历史并不是多么不光荣,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写的文章都是公开的,可以查。”刘英劝他写材料时要写明谁可以证明。他说,让他们去审查吧。

9月5日 写出《我的第二次检讨》(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第二次书面发言)。其中回答所谓“里通外国”罪名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我党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①

注:

① 指当时担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写给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信。大致内容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党的工作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是失败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跑得太快了;党内迎合情绪严重,因而主观主义得以畅行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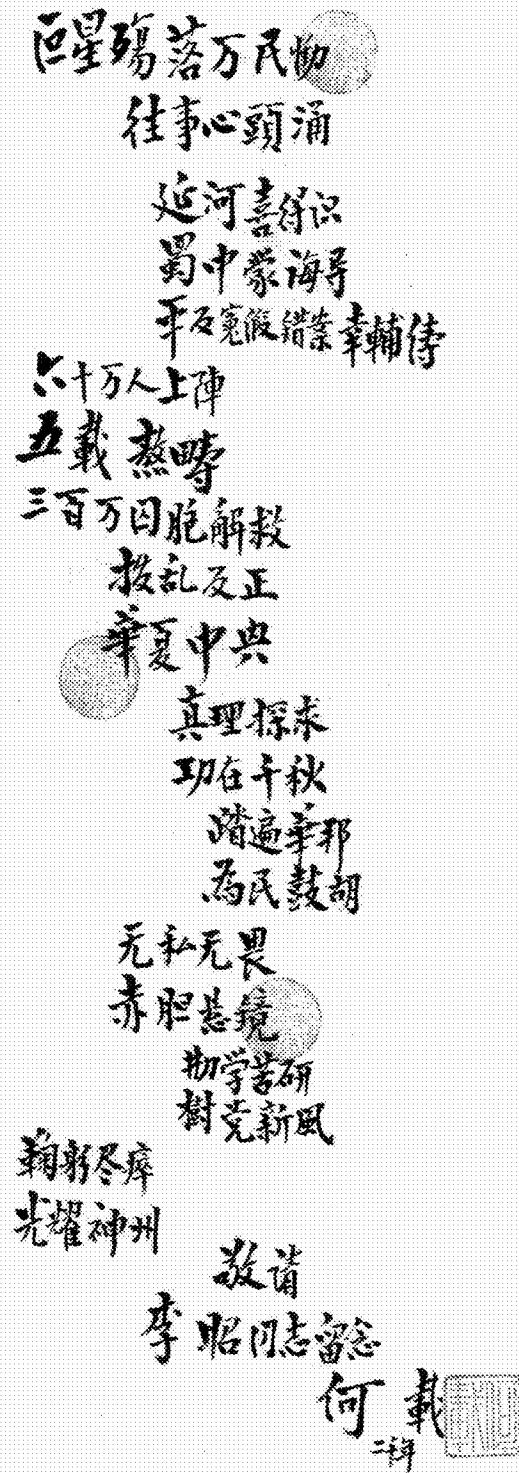
② 此信没有给张闻天本人,而是直接印成会议文件。

③ 张闻天指同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等人的接触。

④ 刘英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对会上追逼所谓“里通外国”问题非常伤心。他回来跟我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这时他止不住淌下了眼泪。

(责任编辑 杜晋)

这是何载同志为纪念胡耀邦同志八十五冥寿送给耀邦夫人李昭的一首词,经李昭同志同意,特此发表,以作纪念。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20 周年

□ 余广人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 32 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 20 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重温《历史问题决议》 对“文革”的论述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

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发动的原因,《历史问题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这个期间(指 1957—1966 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历史问题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革”的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论述过。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然而,近年来,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却出现了一些与《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理论相悖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也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揪斗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的人把发动“文

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已被《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的左的东西视为法宝,露骨地说,现在需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到1987年,邓小平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洞察秋毫的。上述有的人对“文革”的看法,自然是遇到机会就“翻腾”,这种“翻腾”,表面看来是“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但实质上是从“左”的方面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干扰。

因此,为了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在《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下,将那些已沉入记忆深处的惨痛的历史图像进行回放。

“文革”中毛泽东的悲剧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

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三个月前说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当时他对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自省和忧虑。

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晚年的毛泽东曾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这样去了。(胡乔木在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的谈话,转引自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这位世纪的伟人在晚年之所以如此地悲观,是因为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已经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悖了。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革”是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当然,他在临终的自省中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问题决议》)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问题决议》)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真诚的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革”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何以要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呢?“文革”问题研究专家席宣对此有正确的论述:“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一个领袖提出了推行了错误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也遭到一些负责人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是,领袖本人却坚持认为

自己是正确的,要力排众议,要‘反潮流’。当他要继续推行错误方针时,就不能不更加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崇拜确实是需要的,而且能够多一点才好。”(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革”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文革”期间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的表现。“文革”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造反夺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这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这种全民学习的结局固然令人叹惜,但给毛泽东涂抹上悲剧色彩的还是在中央高层。1976年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文革”如此没有信心,以他的雄才大略,自然是看出了这种个人崇拜并不能永远真正统一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毛的情绪一直是沮丧的。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被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可结果呢,却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毛泽东对其后政局发出了无奈的“天知道”的感慨,自然是他在晚期造成的一种历史悲剧。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文革”,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身上的悲剧,也给整个国家

和民族抹上了悲剧色彩：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很值得后人三思，当然更值得那些至今仍对“文革”持某种肯定态度的人三思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 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这是“文革”中有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并于当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的8月1日，亦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个被毛泽东认可的社论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也响彻全国。伴随着这一口号，农场、学校、干校等都贴上了“五·七”的标签，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

“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提出这一指导思想的依据，则是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分歧。这个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怎样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一直是



大型宣传画——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

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应当说,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自1958年以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构想,盲目地希望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这就不对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一律斥为“右倾”,并冒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就造成了更大的错误。随后而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宣告了这一构想的失败。此后,党中央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但对“大跃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并没有放弃,这就造成了他与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

在大跃进刚刚开始时,刘少奇等人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在1961年刘少奇接触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后,认识便有了改变。所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他认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自然有与毛唱反调的意思。所以,毛泽东不但不会接受刘少奇的看法,反而认为他犯了右倾错误。

另外,当时处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被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1970年,斯诺与毛泽东交谈后了解到了这种分歧,并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这显然真实地反映了毛与刘等人分歧的心态。在毛看来,刘等一线领导人的主张,已不止是“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连他领导的那种社会主义,

也将要毁于一旦。而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也使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更使他把与刘、邓的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毛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后,逐步形成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看法,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概念。于是,他认为,只有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解决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才能贯彻自己思考的那套社会主义的方针。

但是,启动一场大革命,在“砸烂旧世界”的同时,必然要“建设新世界”。而“五七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理想蓝图。

“五·七指示”提出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这就表明,毛泽东不但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支配下,发展经济的方针,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而到后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这样,“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

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阻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胡乔木文集》)同时,“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像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贻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

(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

还应该说到的是,“五·七指示”所倡导的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思想,摒弃商品经济,也给社会政治体制带来弊端。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其“自给自足”式的组织,便类似于一个小社会。这样的一个个小社会,在政治上的管理模式必然是垂直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则要求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否则社会就存在着失控的潜在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政治体制的弊端达到顶点,“五·七指示”自然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历史问题决议》已经进行了论述,邓小平从宏观上也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

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们都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二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另外,李锐算了一笔账,大致勾勒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损失程度,使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日本的1/4,1985年更下降到1/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二十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三十年,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4000—5000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



“家家有毛主席著作、人人读毛主席的书”成为“文革”的时尚

失的 6200 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激增等,即是如此。(前引文)

仅从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来看,“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悲剧确实是划时代的。

现今,重新剖析“以阶级斗争为纲”,落笔不在于分析其荒谬性,而在于从其荒谬性中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

同样的论述,多次出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这些论述,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龚育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巨大胜利表明,只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强大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着纵深处开拓前进,经济繁荣,国家稳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也表明,“前进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事实的确如此。近年来某些持“左”的论点的同志,就认为改革开放引来了资本主义,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的人甚至重弹“反修防修”的老调,等等。这些都是把《历史问题决议》已经否定了的“文革”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继续当作真理。对此,人们必须给予应有的警惕。

红卫兵对民族文化的摧残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六、七月间,他们先后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张大字报,中心意思是“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



孔子像
孔庙大成殿内的明彩塑孔子像,被挖了眼,扒了心,全身贴满了大字报。图为拉倒前的孔

附中的红卫兵。消息传出后,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后,红卫兵组织迅速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成为“文革”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文革”“左”的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这个组织最大的破坏作用,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民族文化进行大扫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布全国。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此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成为“文革”初期的重要口号。

作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便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对文化遗产的摧残。

由大学生、中学生组成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摧残文化遗产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之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也就是从此以后,红卫兵的形象变得更加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

在北京,8月23日,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

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一张张沙发戳了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我国北方城市哈尔滨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并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我国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西藏高原,安放在觉拉寺的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也毁于一旦。在山东曲阜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墓,也被扫荡。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在河南,砸掉了价值连城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在湖南,被中国人一向尊为始祖的炎帝陵遭全部破坏;在浙江,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一千年来人们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在内蒙古,曾被称为“中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陵墓,也被砸了个稀烂。……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再罗列下去。当年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目睹狂热的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曾痛心疾首地惊呼:“五千年祖国的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湮没了!”

现今,对那个狂热时代所造成文化损失,已无法估量,在“文革”后这些被毁坏的文化遗产的重建工作所耗费的经济损失,我们也同样无法估量。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永远不要在我国再出现这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了。

(责任编辑 洛 城)

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 冯建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主席说:地主阶级的人,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主、富农,占乡村人口不到10%,却占有70—80%的土地,他们借以残酷地剥削农民,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阶级的人们的命运不仅和封建的土地制度紧紧连在一起,还和国民党与共产党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密切相关。据经济学家陈翰笙30年代对无锡6个区235名乡镇长的调查,78.3%为地主,13.6%为富农;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据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河南两省的调查,66个区长中,拥有土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70%左右。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调查全省514个占土地千亩

至6万亩的大地主,其中374人为各级军政官吏,即占44.39%。地主富农们不仅与官府密切勾结,不少还拥有自己的武装,用来直接统治和压迫农民。

矛盾的另一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方针、政策,也随着农民与地主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斗争及军事斗争的消长,而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根据地停止实行土地革命,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爱国者即开明士绅,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政权,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炮火中实行的土地改革,一些地区出现滥打滥杀、扫地出门等过火行为。直到建国前夕,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政策,逐渐转变为:经济上消灭地主所有制,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富农则允许其继续“发家致富”。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指出:“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甚至乐观地说:要知三千六百万还是

财富,应当利用,地主阶级的人还有作用,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五年),是候补无产阶级,现在要强迫改造,将来会改好(1948年2月21日由陈毅同志传达)。

建国前后对地主的政策改变,主要表现在:

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由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子。其他财产如货币、金银首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等,不予没收。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讲:“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以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政治上改革单纯打、压的办法,发动农民进行说理斗争。土地改革中有些地主散布:“我给你们地种,你们交租子,这怎么是剥削?”从而引发了“谁养活谁”的辩论。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谁养活谁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辩论情况:

谁养活谁呀,
大家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经过土地改革的政治斗争,“剥削”、“不劳而获”成为最不光彩的词汇。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剥夺公民权,强制劳动改造。同时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可“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1951年5月,《中央关于注意解决土地改革后地主劳动问题的指示》要求:“领导上应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缓和一下”,“对于确



湖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的宣传画

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做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做生意”,“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上是坚决的,不如此就不能消灭剥削,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然而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较为缓和与灵活的形式,特别是在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采取自上而下与民族上层和平协商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对封建领主开展背对背斗争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在处理地主阶级与地主个人的关系上,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剥削阶级要消灭,作为阶级的成员则可以由敌人转变为朋友。预计经过5年左右的劳动改造,可以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正确的做法,使我们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尽量减少了社会动荡,减少了生产力的破坏,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保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和

发展。从理论意义上说,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正确处理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及时调节社会各种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我们和苏联的做法也有明显的不同。苏联对富农剥夺财产,放逐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实行武装看管,强制劳动,边疆的许多“富农村”,实际上就是劳动集中营。我们在建国以后,则由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对划定富农的标准也比过去严格了许多,“凡雇请一个长工”的家庭,“不必去计算其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便超过了也不算富农”。这一时期,富农并没有被视为敌人,1950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公布“中立富农”口号,认为“允许富农加入农会对农村生产是有利的。”

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中也确实杀了一部分恶霸地主和地主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但镇反运动并没有造成对地主、富农政策的明显改变,到195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都被批准加入农业合作社。据有关资料统计,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50%左右;候补社员占4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10%左右。新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20%左右;候补社员占6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20%左右。入社的社员成分改为农民(相当于中农),候补社员成分暂时不变。

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富农子女规定了正确的政策,直到50年代中期,执行情况也还是比较好的。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座谈会的谈话中,讲到当时的学校情况时说:“现在大学生70%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我们要团结教育他们。他们入学、入团,助学金问题,戴红领巾问题,青年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一视同仁,要看表现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为渊驱鱼”的政策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一部分开始富起来,农村出现买卖土地、租赁、雇工、借贷现象。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出现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了两极分化。于是开始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发家致富”、“四大自由”等口号,认为:“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一步把农村划分为两大势力,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贫下中农,拥护农业合作化,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认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

进入60年代,面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和腐败现象,把其根源归于地主、富农的腐蚀拉拢,进一步把农村中两种势力、两条道路的斗争提高到保卫和重新夺取政权的高度。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则批语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于是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重新划分阶级,组织阶级队伍,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阶级斗争的运动愈演愈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对富农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土地改革以后不久,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即遭到否定。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不是一项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毛泽东则更多的着眼于策略的需要:“土改中不动富农可以避免弄乱”,“可以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以及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上来。再加上这一时期,有一

部分建国前进行土改的地区发生了富农和地主一起向贫雇农夺地夺房,索租讨债事件。有资料说,仅天津专区五个县统计,就发生要求退地还财的事件 117 起。1953 年 12 月,中央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正式宣布,党的政策改变为:“逐步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此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政策和做法上也逐渐出现“左”的苗头。有些地区把批判富农这个反面教员,作为推动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手段。如浙江省有的地委提出搞合作化要“抓两头,带中间”,即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有的县专门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领导干部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就跟他们(被斗富农)一样!”有些不愿意入社的农民,怕富了冒尖,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起日子不好过,只好要求入社。这些做法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认为虽然这种做法有点强迫,但也未尝不可以。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示:“有些地方清算富农,是杀鸡给猴子看,他对富农砍一刀,叫中农看,你说这不叫强迫!”

地主阶级分子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体现者,广大农民的直接剥削者和压迫者,其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在土地改革之后不可能马上消失;就地主分子本人讲,由好逸恶劳的剥削

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中央规定暂时剥夺地主分子的公民权,进行强制性劳动,就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需要的;同时也规定了守法者五年可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问题在于从历史的实践看,这一过程却延续了整整30年。其间,“帽子”戴了摘,摘了戴,反反复复,且“帽子”分量有愈来愈重之势,造成了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特别是如何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中央虽然有“有成分而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等政策，但在实践中“左”的东西却越来越突出。60年代以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在许多方面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1963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就曾列举了当时的种种表现：“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

江苏省林隐乡第五村的划分阶级榜



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

该文件一方面指出:“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也要防止“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的“偏向”。到1964年9月10日,中央正式公布上述文件的《修正草案》时,也增加了对地主、富农子女歧视性条文。如“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我们党在对待地主、富农问题上,特别是在地主、富农子女政策上,为什么会有50年代初的正确的政策一步一步走向歧视性的甚多不恰的政策呢?50年代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家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总结教训说: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早在1949年10月11日,党中央即以《新华社信箱》的名义答复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时宣布过: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要强调阶级划分,特别是不要强调中贫农的界限;否则,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1950年8月4日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有过土改完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的规定。1953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提出了‘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的口号,这是淡化中农和贫农界限的一个步骤,从7月31日报告到《高潮》一书强调的依靠贫下中农、

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的口号,在十年动乱中又变成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口号。这除了在农村容易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错觉外,对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方面产生唯成分论的偏向也有重要影响”(该书第399页)。

这种“阶级政策”在理论观点上,明显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毛病。它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看得比欧洲的工人阶级还先进,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拥护者。把土地改革以后出现的“分化现象”,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退社”、“单干”现象,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分田到户”,以至农村干部在“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统统归于外部影响的结果,即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煽动、腐蚀、拉拢的结果。这种“和平演变”的说法,在哲学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外因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的观点,正是在“外因论”的思想影响下,为了巩固政权和顺利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只好不断加强对地主、富农的批判与斗争。

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论断,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10条”)中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曾对此提出疑问:“难道阶级成分也能遗传吗?”果然不出田家英所料,60年代“血统论”日益盛行起来。“文革”初期,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口号鼓动下,在堂堂的首都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竟然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再加上“文革”期间一大批当权者被打倒,子女立刻变成“狗崽子”遭受株连,备受歧视的残酷事实,使许多人对“血统论”的荒谬与危害,逐渐有了

切肤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主富农统统摘帽,上千万人获得精神解放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列举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年中,在拨乱反正方面做的七件大事,其中第四件是:“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的确,仅就地主、富农摘帽而言,它不仅使几百万政治上没有公民权,行动上没有自由的罪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也使上千万备受歧视的地主、富农子女们,改变了贱民的社会地位,获得精神解放。

三中全会以后,把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当成一件大事来抓,是因为已经深感“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脱离我国1957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80年代初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郑重宣布:“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党的著名理论家胡乔木,1981年9月14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办的“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对此做了具体阐述。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些,除了一些地主保留了一些变天账啦,或者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时有些地主说了一些什么话啦,其它的事情,实在也很少。因此,阶级斗争到哪儿去找呢?后来就越来越到党内来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修订本)进一步补充了如下历史事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被陆续改变了成分。没有办理改变成分手续的,绝大多数也已成为守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即使在十年内乱期间,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也只占极少数”。经济学家许涤新在1978年一

次讨论会上,进一步讲到“文革”以后的有关情况:“仅工商行政部门1975年—1977年的三年间,查获的投机倒把大案有65000余起,……这些大案的作案人竟达30多万人,其中,老的剥削阶级分子不过占6—7%”。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并于1月29日由《人民日报》公布。“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致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宣布:“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7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长赵苍璧答记者问,根据“决定”精神做了若干具体补充:“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不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负责地给以纠正。即使是已经死亡了的,如果确实是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也应给以纠正”;“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以后”,“至于有人犯了罪,那就应当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而不应当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党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197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的社论,总结“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批判了极左路线,指责“搞反动的血统论,把地、富、反、坏的子女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同样看待,甚至连地主、富农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主、富农分子,‘为渊驱鱼,为丛

驱雀’，蓄意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摧残青年一代的身心”。社论科学地分析了广大地、富子女的状况，指出他们“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新社会，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不是靠剥削而是依靠劳动收入生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

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全国各地立即严肃认真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评审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改变成分工作。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至1980年底，全国只剩有地主分子4万余人，富农分子2万余人。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79260人，进行评审摘帽。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属于错划，予以纠正，恢复名誉；195人有现行犯罪行为，依法办理；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给予摘帽，然后进行帮助教育；对已经出国、出境者，也全都摘掉帽子，并通知了他们的家属。198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全国给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建国以来对两千多万四类分子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进一步消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为我们国家走上以民主和法制治国道路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们，从“惟成分论”、“血统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生产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焕发出很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大邱庄的农村基层干部禹作敏说：“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都是敌人；用‘文革’观点看人，历史上有功的人成了罪人；用派性观点看人，逆我者是仇人；用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看人，到处都是能人”。禹作敏本人后来出了问题，但他的这一感受，应当说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

《人民日报》1987年7月14日发表一篇报道

更从事实方面，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该报道名为《准备起飞的两个翅膀——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之三》（吴象）：

“嘉山县石坎乡农民何玉秀，是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和岳父又在港台，一直受到歧视。但他身处逆境并不消沉，潜心钻研农业技术，先后成功地引进和培育了西红柿、大白菜、水稻等良种。结果未受到鼓励，反屡遭训斥。后来乡党委书记力排众议，选拔他为农科队长。他大胆改革，改变了农科队的面貌，当年人均收入2400元。一些人眼红了，有的写信偷偷诬告，有的公开恐吓，最后发生了哄抢农科队的事件。乡党委对此作了果断处理，顶住了歪风。这位书记经过一段教育和考察，决心冒风险，介绍何玉秀入党。几年来石坎乡杂交稻制种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区杂交稻良种基地之一。1983年何玉秀当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县种子公司副经理。”

这篇报道所讲的事例也表明，多年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惟成分论”的思想影响，在一些人中还有很深的印记，贯彻落实中央决定，也还遇到不少阻力。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据1992年3月31日《报刊文摘》报道，近几年辽宁省有些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土改、镇反中被镇压或没收财产的反革命、地主、富农分子及他们的亲属，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事件。如抚顺市顺城区原地主子弟柳某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向政府索要土改时被没收的2650亩土地。凌源市四个乡镇有六户强行抢占并扒毁集体房产，占为已有。

以上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留下的历史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消除的。好在我们党和全国大多数人，对此有着较为准确的理解，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重新大搞阶级斗争，而是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对个别犯法者依法严肃处理；一方面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实事求是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以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明天。

（责任编辑 洛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战火中诞生

□ 杨兆麟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

1940年12月30日的傍晚，这庄严、自豪的声音，从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偏远山村的窑洞里，飞向辽阔的天空，响遍神州大地，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去了真理和希望。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日。

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虽得以在武汉和重庆出版，但因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发行范围和数量受到很大限制。为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打算在延安建立一座广播电台，以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可是，延安既没有发电设备，也没有广播技术人才，关键是没有一部广播发射机。

1939年9月，周恩来因右臂受伤到莫斯科治疗，12月间出院后，他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秘书长哥特瓦尔德的会谈中，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问题，共产国际决定，援助一部苏联制造的广播发射机。1940年3月上旬，周恩来、任弼时等启程回国，把广播发射机拆卸成

散件，装进木箱，先后乘火车、飞机、汽车，长途跋涉，于3月25日到达延安。

为了领导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成员包括负责通讯工作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通讯社社长向仲华等。1940年5月，周恩来前往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广播委员会由朱德领导。1940年7月，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商定，从抗日军政大学抽调正在学习的红军指挥员、有打窑洞经验的阙明，负责广播电台的土建工程。朱德找王诤和阙明说：“电台是我们党的喉舌，通过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这项工作很重要，你们要赶快行动，时间不等人啊。”他们则表示：“请总司令放心，一定把我们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立起来。”

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袭击，王诤和阙明反复勘察，选定延安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作为台址。这个小山村只有9户人家、40多口人，延河支流西川从村前蜿蜒而过，河南岸的墩儿山上有一块大岩石，正好打出两孔石窑洞，作为动力间和发射机房，地形隐蔽，十分安全。延安一乡乡长袁德万调集了一批壮劳力，配合阙明带来的工人，开始了土建工程。日夜奋战，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打出两孔石窑洞，

几孔土窑洞，盖起了作为播音、发报、办公和住宿的土坯房。

在重庆的繁忙工作中，周恩来仍然关注着延安电台的筹建工作，决定把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曾经在清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的傅英豪、唐旦夫妇派往延安，解决技术问题。王皮湾的窑洞打好以后，军委三局决定抽调 30 多人，成立九分队，承担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的任务，队长是傅英豪，政委是周浣白，支部书记是毛动之。发射机的组装，损伤件的修复，补缺器材的制造，都由三局的材料厂和九分队的同志们负责。由于延安汽油奇缺，为了解决动力问题，他们找来一台已经报损的汽车引擎，大修后用皮带连接到发电机上。又找来两个大汽油桶，上下焊接起来，做成烧炭的土造的煤气发生炉，再用管子接到汽车引擎上，他们点燃木炭产生煤气，煤气使引擎旋转，带动发电机发出电力，创造了世界广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11 月试播前的一天下午，朱德来到王皮湾视察，鼓励电台的同志们狠狠地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全国人民，一心抗战到底，夺取最后的胜利。

延安电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提供，向仲华兼编辑科长，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刘志刚和李伍。1939 年 4 月到 1941 年 5 月，新华社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办公，后来迁到清凉山上，成立广播科，李伍任科长，先后调来陈笑雨、王唯真做编辑工作，秘书陆果木也参加编稿。他们每天要编出一套文字广播稿和一套口语广播稿，各约 8000 字，由通信员送往王皮湾。

延安电台最早的播音员，是从女子大学调来的徐瑞璋和姚雯，后来接替她们的是肖岩。1941 年 1 月 22 日下午，通信员按时把稿件送到王皮湾，那是中共中央军委为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都是毛泽东撰写的。小徐和小姚立即反复阅读，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点亮油灯，每人播出一遍，揭露了事变的真相，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态度、鲜明的观点和战斗的风格。

延安电台的广播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下令各有关单位进行侦测、监听和干扰，并且阴谋加以破坏。他们把这称为“海陆空三条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延安的声音每天飞向万里长空，不仅在各根据地，而且在大后方和沦陷区，都有很多人收听，不少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和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和小报，秘密散发。有些听众把延安广播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党中央十分关怀和支持处于幼年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1941 年 3 月至 6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连续向各地党委发出文件，要求他们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强调指出，广播是“近代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发展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这年夏天，毛泽东听说延安电台有一部手摇留声机，就派人把自己保存的 20 多张唱片送去，嘱咐延安电台的同志努力把广播办好。周恩来派人把自己乘坐的汽车上的引擎拆下来，送到九分队，以便轮换使用，保证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的电力供应。

为了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教育日本士兵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延安电台在 1941 年 12 月 3 日开办日语节目（每星期五广播半小时），这一天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诞生日。先后担任编译工作的有刘愚、王文庶、张纪明，播音员是已经加入中共的日本女青年原清志。

延安电台早期的文艺节目只是由播音员和机务员吹口琴、唱歌和放唱片。为了丰富节目内容，他们约请材料厂的同志们来演播过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的片断。还约请总政文工团来演播，由于合唱队和乐队的人数很多，窑洞里挤不下，只好排列在山坡上，把话筒移到外面，向着山峦和溪流、夜空和星光，使那嘹亮的歌声和雄壮的乐曲，飞上云天。

由于发射机上的大型电子管损坏，一时无法补充，延安电台不得不在 1943 年春暂时停止播音。3 月 8 日，朱德再次来到王皮湾，安慰和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争取早日恢复广播。

二

1944年春，八路军在晋西北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台锅炉和一台发电机，党中央决定把它们运到盐店子村，交给三局使用。九分队的同志们把它加工、改装成一部25匹马力的蒸汽机，安装在路边的“关帝行宫”大院里。同时，在村口的小山包寨子岭上，盖了两间土坯房，把重新设计、安装的发射机安放在这里。在半山腰打出三排土窑洞，作为发报房、播音室和宿舍，从这里发出新华社的文字广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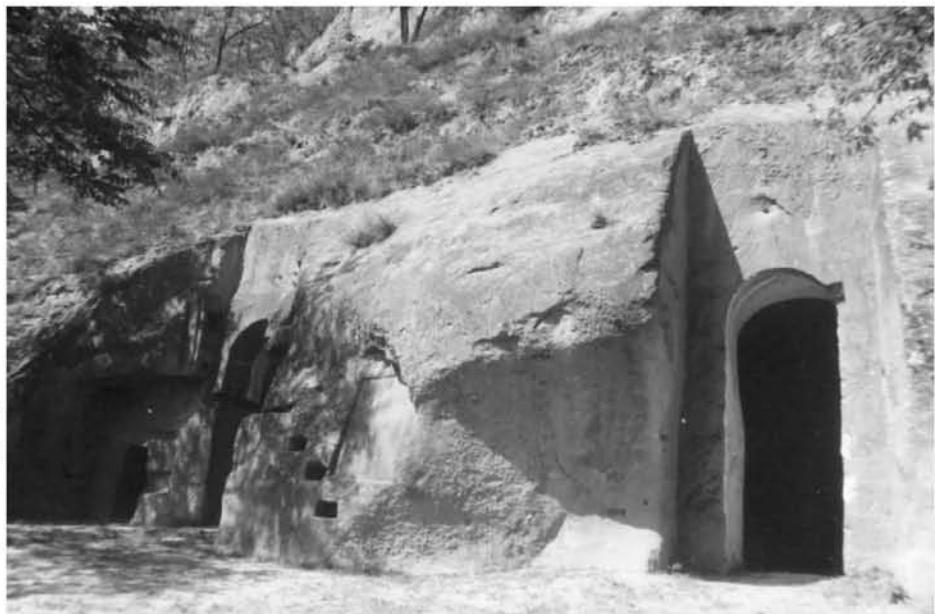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无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支，同时依靠美国军队的海陆空运输，向解放区大规模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要求三局尽快恢复口语广播。九分队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检修机器，很快开始试播。当时还没有调来播音员，就由机务员临时上阵，广播了朱德总司令给解放区各武装部队的命令，要他们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还广播了朱总司令给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让他下令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3日和16日，又广

播了朱总司令答复蒋介石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正当行动的电报和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揭露蒋介石正在挑动内战。不久，李慕琳、孟启予来到盐店子，担任播音员。9月11日，延安电台正式恢复广播。10月8日，新华社成立了专门的语言广播组，组长杨述，编辑是张纪明、韦君宜。

为了改善播音条件，三局在延安以西11公里的裴庄修建了砖木结构的大播音室。三局也迁到裴庄办公。11月间，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来到裴庄视察，毛泽东对通讯工作和广播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朱德、彭德怀和主持新华社、《解放日报》工作的博古等，也到裴庄来看望三局和延安电台的同志们。

1946年1月，刚从延安中学毕业的王恂被调到裴庄，成为延安电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时间不长，他报名参军，到前线去了。这个时期，陆续调来了女播音员钱家楣、于一、杨慧琳、吴作贤。1946年5月，新华社语言广播组扩大为语言广播部（简称口播部），即延安电台编辑部，部主任温济泽，编辑有韦君宜、苗力沉、刘志云、刘衡、高虹。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和延安电台的机务工作从三局划归新华社电务处统一管理，处长耿锡祥，副处长李伍。从此，延安电台的编辑、播音、机务部门初具规模了。

延安王皮湾村
墩儿山上，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的动力间
和发射机房
本文作者摄于
2000年5月





延安(陕北)新华社广播电台在瓦窑堡好坪沟村的机房(下)和播音室(上)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伪“国大”。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和代表团的部分同志，在11月19日撤回延安。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刚刚回到延安，即召集王诤和新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开会，研究战备问题，决定在延安以北90多公里的瓦窑堡（现子长县）建立战备台。1947年元旦，延安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祝词》。同一天，朱德到延安电台发表广播讲演，分析1947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明确指出：“只要全解放区军民和全体爱国同胞坚定胜利的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三

抗日时期，我在四川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工作。1946年2月到1947年3

月，先后在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即中共代表团新闻组）做编辑工作；1947年3月初，随董必武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留守人员撤回延安，被分配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工作，在清凉山上开始了我的广播工作生涯。

在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的时候，新华社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撤往瓦窑堡。语言广播部和其他几个部门在史家畔村工作，我们借用老乡的窑洞，白天盘腿坐在炕上编稿，晚上挤在一起睡觉。机房和播音室设在相距10公里的好坪沟村，村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楼，机务员李志海和刘振中把门洞的一面堵死，成为机房和宿舍。上面是一座小观音庙，只有一张三条半腿的供桌，垫上土坯，摆一个话筒，就成为播音室兼宿舍了。3月13日，延安电台播出了最后一次节目，第二天就在这座小庙里接替了播音。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延安以后，改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3月25日下午，戎马倥偬中的周恩来到好坪沟视察，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保证不要中断广播，因为这期间陕北台是对外宣传的唯一的工具。傍晚，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也来到好坪沟，登上小庙，静静地站在钱家楣背后，听她播完音，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军今天上午在青化砭打了陕北战场的第一个大胜仗，正在清理战果，查清了以后要广播。3月28日，陕北台广播了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以后，我们连夜从史家畔和好坪沟撤退，远处传来了敌我交战的枪炮声。这半个月，是延安（陕北）电台环境最险恶、设备最简陋、条件最困难的时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广播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中央及时分析了战局的变化，早在3月初就通知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老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组建新华社临时总社，并且准备接替陕北的广播。军区三处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们通力合作，改装和制造各种设备，抽调编辑和播音员，做好了准备。3月29日，从涉县沙河村发出了陕北台的呼号，再次报道了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保证了广播一天也没有中断。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莫名其妙。延安（陕北）电台竟如此巍然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

他们用什么奇异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坚持了播音。

新华社人员,包括延安(陕北)电台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千里转移,到达涉县,和临时总社会合,编辑部设在西戌村,机房和播音室设在相距两公里多的沙河村。

坚持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密切关注着新华社和陕北电台的工作。1947年5月间,他们在安塞县王家湾村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陕北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在报道蟠龙大捷和祝捷大会的消息、评论,毛泽东称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第二天,远在涉县的陕北电台收到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嘉奖电报,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做好广播工作。不久,陕北电台每天的节目增加到三个小时。原在编辑部工作的齐越被调到播音组,成为延安(陕北)电台的第二位男播音员,他从此终生从事播音工作。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在率军南下之前,到沙河村看望陕北电台和邯郸电台的同志们,强调广播工作的重要性,希望他们给远离后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及时提供更多的消息。11月间,陈毅在前往陕北出席中央会议的途中,到西戌和沙河看望新华社和陕北电台、邯郸电台的同志们。他在西戌村的一个大四合院里,对站满、坐满院子的同志们讲话,纵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明前途。他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当兵打仗,是在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流血牺牲的,你们在后方做新闻工作,是一点一滴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既深刻又生动的、诗一般的语句,成为我终生从事新闻、广播事业的座右铭。

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间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先期到达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新华社和陕北电台接到通知,第三次转移,从涉县迁到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韩家峪等几个村子,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5月28日,陕北电台在20公里

以外的张胡庄开始播音。7月间,原来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撤消,编播人员黎伟、柳荫、郑佳、胡旭、丁一嵒、陈晨等到达平山,参加陕北电台的工作。10月间,为了保证安全,并且获得充足的电力供应,机房和播音室又迁到40公里以外、井径煤矿附近的窟窿峰村。

解放战争发展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新华社的不少重要稿件都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审阅、修改。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在半个多月,陕北电台先后广播了毛泽东审阅、修改和撰写的五篇广播稿,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12月18日,范长江率领由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人员组成的统一编辑部,从西柏坡出发,前进到北平郊区待命。准备接管电台的人员有徐迈进、李伍、胡若木、杨兆麟、胡旭、齐越等。1949年1月31日,我们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接管了各个新闻机构。2月2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对本市播音。3月25日,陕北电台随党中央进入北平,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对全国广播,原北平新华台改用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

6月15日晚,全国亿万人民第一次从收音机和扩音喇叭中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那是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9月21日,全国人民又听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7日,政协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北平为首都,改名为北京。于是,北平新华台改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电台都联播,毛泽东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全国广播的电台,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

(责任编辑 洛松)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 严纪青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

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



生于一九一九年,又名陈震东,江苏省南京市人,病逝于一九七八年。

“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火山”爆发的前夜

不愿作亡国奴的南京广大青年学生,对日伪一手制造的甚于洪水猛兽之烟祸,尤感切肤之痛,他们压在心头上的悲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触即发。厉恩虞、王嘉漠同学就是这样一大批进步学生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45年秋王嘉漠在江宁县委由鲁平介绍入党;然后厉恩虞由王嘉漠介绍入党),但他们品学兼优,博览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向往之。他们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宣讲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较之抗战初期已有较大发展,并时刻关注着学校青年学生的动态。地下党派党员潘田于1941年11月组织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积极对青年学生开展工作。厉恩虞、王嘉漠等进步同学参加“青救社”并成为主要成员后,“青救社”迅速发展壮大。由于“青救社”和厉恩虞、王嘉漠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影响大,威望高,当他们吹响清毒的号角时,立即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迅速形成一股斗争的洪流。党组织从中具体指导,教育学生骨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厉恩虞同志利用汪伪《民国日报》的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敌伪内部矛盾的情况,从中发现了日本、汪伪之间在毒品利润分配上的“狗咬狗”。原来,日本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

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汪精卫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国民党CC派的骨干)。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想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在汪逆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林柏生这一阴谋早被厉恩虞同志获悉,并曾向党组织汇报,提出可否借此机会开展一个清毒运动。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南京在日军严格控制下,老百姓说一句抗日的话,便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搞硬碰硬的群众游行示威,肯定要吃亏,主张不能盲动。提出了自始至终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为林所利用的原则,只有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公开提出保证后,才可行动,而且在行动中还必须讲究策略,喊口号时主要喊“打倒烟、赌、舞”,集中重点打击日伪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问题,使敌人的反击无从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绍忠,找中央大学厉恩虞、王嘉漠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开始行动,并表示保护游行人员安全。厉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潘田同志作了汇报,认为开展清毒运动的时机成熟,最后又得到上级党的批准。正如鲁平同志为厉恩虞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无尽的追思,真挚的怀念》中所说:“厉将这一情况向领导‘青救社’的潘田同志

汇报后，并共同研究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案，经过地下党南京工委（属苏皖区党委）书记舒诚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惊天动地的吼声

1943年冬，沉闷无声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怒吼了。

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我们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



王嘉谟教授，生于一九二三年，病逝于一九九五年

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晚我们又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王嘉谟主持，厉恩虞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他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厉还号召把这场清毒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彻底清除毒患。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并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

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漫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

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突击大毒窟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饭店,是敌伪上层人员荒淫无耻的享乐场所,每天有无数敌伪官员出入其间吞云吐雾。“清毒会”得悉后,于1944年5月6日率领数百名青年学生前往突击搜查。学生队伍尚未赶到饭店,便惊散了吸毒的敌伪官员,狡猾的饭店经理江政卿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学生仍然冲入饭店,分层把守,逐层检查,终于查出私藏的鸦片烟土3000多两。在一家饭店中,竟收缴这样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据有关史料介绍,学生清毒运动起来以后,汉奸内部发生剧烈争吵,在一次伪行政院会议上,周佛海集团中主管烟馆税收工作的内政部长梅思平,对林柏生大加指责说:“烟馆、烟行都是经过批准缴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给予保障,你怎么鼓动学生去冲砸烟馆……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来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闹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上上街,游游行,喊喊戒烟口号,最多装样子砸几家烟馆,对“CC集团”施加一点压力,分得一点好处,谁知竟闹成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不但南京大闹,沦陷区各个城市也纷纷响应,闹



本文作者、东南大学离休干部严纪青近照

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于耍嘴皮子的林柏生,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便阻止,你们说我在组织青年,惭愧得很,是青年组织我,不是我组织青年;是青年训练我,不是我训练青年;是青年领导我,不是我领导青年。青年们起来为社会扫除腐恶现象,那是他们的热血、热情和热力团结在一起,为了救国,为了救民,甘把热血洒在受了创伤的国土上。”(据周佛海集团核心人物罗君强的交待材料和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回忆)

林柏生这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的实情。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林柏生时,林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这当然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彪炳史册的功绩

40年代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清毒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青年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祸首——日本东条内阁和军部。种植、贩卖鸦片,是国际上公认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干这种坏事,为了逃避罪责,一直是偷偷摸摸秘密地进行。他们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见夫”,拉拢中国败类盛文颐共同开设以经营毒品为主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毒化机构。青年学生开展清毒运动,揭开了“宏济善堂”的内幕,也把东条内阁从中攫取巨额经费揭露出来。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内部也骚动起来,东条内阁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与指斥。清毒运动开展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政潮风波”,即借以对东条大肆攻击,一些反对派国会议员列举种种事实,指责驻华日军贩卖毒品。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惨败的东条担心再引起中国占领区的大动乱,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减缓占领区中国人民

的愤怒,东条叫大本营指导部部长荻发表一篇公开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是中国人盛文颐主持的,“与皇军并无关系”。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欲盖弥彰,反而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东条又派他的亲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权力,作为军部大员来华,对日军进行所谓“整肃军纪”,并着手结束“宏济善堂”一切活动和同意汪伪政府按学生要求禁毒。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从当年4月开始,限期三年禁绝,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等。尽管这个条例由于汪伪政府的腐败,军警风纪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但历史证明,即使在敌占区,从此毒焰猖獗之势已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

清毒运动教育了群众,激励了群众,树立了“中国不可侮”的信念,发展了进步力量。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开拓了视野,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

(注:亲历者严纪青,知情者巫昌必,审稿者潘田)

(责任编辑 洛松)

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 秦维宪

2000年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和主持正义的学者,向日本法西斯的兽行发起猛烈攻击的一年。

9月17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丽菲女士,作为中国大陆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举行的慰安妇幸存者听证会,向日本法西斯发出血泪控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朝鲜、东南亚各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及律师、学者参加了会议。18日,15位亚洲慰安妇幸存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

9月下旬,上海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等三人,作为原告在美国法庭起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赔款、致歉。

12月8日至13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将在日本东京开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

存者万爱花等八位受害者准备出庭(这是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出国),将在现场控诉日军兽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赔款、致歉要求。大陆方面的学者、律师、翻译、记者20多人,将随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著名法学家周红钧律师出庭。

学者发出伸张正义的吼声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延缓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给千百万战争受害者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旷世罕见的二战为例,虽然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两个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政府,不仅至今没有向战争受害国,尤其是中国谢罪,向战争受害者赔偿损失,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一次次猖狂否定那段残忍的历史。这,既反映了历史的不公平,又警示今人:战争的潜流依然在悄悄地涌动。

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背景,二战期间,日军在上海首创的慰安妇制度,更值得学者作深入的研究。

据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统计:二战期间,超过40万的亚洲妇女先后沦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也



亚洲慰安妇幸存者的控诉照片(秦维宪摄)

即“慰安妇”。慰安妇制度产生于上海。为解决日军官兵的性欲问题及避免因性病而带来的非战斗减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策动下，在上海建立了一批较为正规的慰安所。冈村宁次后来坦白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最初慰安妇来自日本，也有部分来自朝鲜。随着战事的扩大，慰安妇已远不能满足日军需求，其铁蹄所至之处，纷纷设立规模不等、名目繁多的慰安所，大部分慰安妇均就地征集，这一过程充满了侵略者的兽性和血腥味。其中，中国慰安妇超过20万。

当年慰安妇许多遭日军蹂躏而死。又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幸存的慰安妇已寥若晨星。她们的悲惨遭遇，她们的灵与肉的损失，现在再不向日本当局控诉、要求赔偿，更待何时？

今年3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韩国挺身队研究所代表尹贞玉教授激愤地说，高度军事化组织化，以性虐待为目的的慰安妇制度骇人听闻，这种以金钱和暴力来实施的性奴隶制，有什么人权可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做到三点：一是向被害者和被害国谢罪；二是惩罚罪犯；三是向被害者作经济赔偿。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责任。

朝鲜“慰安妇”及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明玉义正词严地指出，由于日本的武力侵犯，使朝鲜及亚洲的几十万妇女遭受惨无人道的性摧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慰安妇的贞操和生命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战争过去已55年了，日本政府仍不谢罪和赔偿，我们一定要以民主、独立、自尊的意识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从而杜绝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的性暴力、性奴隶问题。

日本女性·战争·人权协会代表志水纪代子教授真诚地发言：我们作为加害国的妇女，对于日军实行的残酷的慰安妇制度，深感痛心和愤慨。我们有责任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对被害国及被害者谢罪、赔偿；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产生这种性虐待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后，



山西的万爱花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妇女

我们作为日本国民，将坚持不懈地与右翼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日本华侨促进交流会秘书长林伯耀以沉重的心情，先介绍了今年1月大阪右翼势力一个主要人物的发言，那个家伙居然说：“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没有一个中国女人怀孕，因此也没有什么日军强奸之事。”林先生怒吼道：“这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辱啊！”然后，他大声说，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三位受害者是勇士，但现在敢于站出来的受害者实在太少了，我希望新闻报道要少点大男子主义，鼓励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中国应该公开全部有关慰安妇的资料，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以倾听受害者的心声，让女同胞得到尊严。因此，政府、民间和学者都要进一步努力，共同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会上庄严地宣读了将于今年12月在日本东京开庭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

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然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在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依照普遍的国际人权及女性的人权观念,恢复性奴隶制等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正义与尊严,是构成国际市民社会的我们每个人道德的责任,也是国际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并由实施了日军性奴隶制的加害国的日本来组织。由被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还有国际咨询委员会(关于女性人权的专家和活动家)这样三方面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

苏智良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设立这一法庭尚属民间性质,不能起到真正的法律效力,但以此可以促进日本政府的谢罪和赔偿。更重要的是,通过“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希望把这苦难的历史让全世界了解,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的到来。

慰安妇高呼打倒日本鬼子

3月30日下午,会议进入慰安妇幸存者现场控诉日军暴行程序。来自海南的陈亚扁、山西的万爱花和上海的陆秀珍,由她们的亲属搀扶着走上主席台,她们的血泪控诉,一瞬间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暗岁月。

海南的陈亚扁(嫁到卓家后改姓卓),是海南岛祖关镇祖孝村人。1942年17岁时,被驻在小黎寨的日本军队抓进兵营,同日被抓的七个姑娘,她们被抓进兵营后,白天为日本兵烧饭、洗衣,晚上为他们唱歌、跳舞。半年后,又被运到三亚,关在一幢两层楼房内,窗被钉死,门被反锁。她被关的第二天晚上,便被一个日本军官强暴。从此,天天有日本兵来强暴她。稍有反抗,便是一顿痛打。直到抗战胜利,她才脱离苦海。

因她在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之前,已有一个叫卓开春的恋人,她从三亚回来后,得到卓的同情,婚后二人虽然感情很好,却因她当慰安妇时备受蹂躏,多病缠身,前后怀孕六次,全部流产。第七次怀孕后,丈夫及早送她到医院保胎,总算在1964年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最使她伤心的是那段非人生活带给她的长期不能挥去的心灵的创伤。她遭到同胞的白眼、讽刺,甚至有“文革”中的辱骂、批斗……

山西的万爱花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勇敢的妇女,曾四次去日本声讨日军暴行。她于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4岁那年,吸食鸦片的父亲将她卖给了人贩子,最后被辗转卖到了山西孟县羊泉村,成了李五小家的童养媳。到了羊泉村,她改名叫灵玉,1938年日军侵入孟县时,她加入了儿童团,14岁时与李五小解除婚约,嫁给了长她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

1943年6月,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她没来得及逃走而被捕。由于叛徒的告密,她的抗日身分暴露。白天,日军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她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轮奸她,她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用香烟头烫。她在被关押、蹂躏21天后逃回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她再次被日军抓入进圭据点,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9月16日,她趁据点日军外出扫荡的机会,再次逃回羊泉村。12月8日,她第三次落入虎口后,日军为严惩她的连续逃跑,轮番审问拷打她,疯狂地轮流对她施暴,多次将她折磨得昏死过去。

当一位年轻记者问万爱花“时隔50多年,起诉日军暴行还有无充分的证据”时,万爱花激动地说:“有!我的耳垂为什么被撕裂,肋骨、胯骨是怎样伤残的?只要我不死,这就是永远的证据!”万爱花控诉到伤心之处,禁不住高喊:“打倒日本鬼子!”

上海的陆秀珍因年届83岁高龄,且身体极其虚弱,由其养子代为控诉。

陆秀珍是上海崇明人，1937年“八·一三”抗战失败后，日军打进了崇明。大约10月初，河东徐其狗的妻子叫陆秀珍到庙镇去，说是替她作媒。到了庙镇，却被汉奸关了起来。先是被一个日本军官独占，后被许多日本兵强暴，成了日军的性奴隶，致使陆秀珍终身不能生育。其养子代言控诉说：“我之所以积极支持母亲出来讲话，是因为她受了日军的凌辱，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毁了她终身的幸福！”他代母亲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政治上要道歉；经济上要赔偿。如果日本政府不肯，那么，我们要通过国际法庭索赔，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是必须偿还的。

研讨会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唯一健在的“八一三”抗战的战地记者、著名杂文家冯英子先生，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本身就是日军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他的前妻就是被日军强暴致疯的。为此他曾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交过起诉书。冯英子认为，慰安妇问题作为性奴隶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战争本身更残

酷，我们必须只争朝夕，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中国首倡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苏智良先生穷八年之功，足迹遍布海内外日军铁蹄所至之处，在上海、海南、山西、山东、香港等地调查、寻访慰安所遗址和当年的慰安妇，在对部分慰安妇的采访和史料的挖掘中，血迹斑斑的慰安妇制度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苏先生在对此作出卓有成效的奉献的同时，还怀着深深的遗憾。在慰安妇的血腥史中，中国妇女受害最烈，反抗亦最烈；然而，由于中国妇女传统的贞节观，至今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只是少数。苏先生痛楚地说：“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研究日军实施随军慰安妇的罪恶历史时，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郁闷，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责任编辑 文 贤）

新“酒令”

□ 杜导正

读过《红楼梦》的人，知道“酒令”是怎么回事。宴会上，公推一酒令主，酒令主出几个词，按席位轮流将几个词编入自己说的几句话中。刘姥姥与薛蟠的酒令词，更有名的，令人喷饭的。近日一友从某省来，说当地某县官吏，宴会后，县长发话：今日不谈政治，行个酒令，怎样？众人唯唯。县长作主说，每人五句话，每句话依次嵌入“圆圆”、“尖尖”、“千千万”、“万万千”、“没有”五个词儿。县长先带头说：“桌子圆圆，筷子尖尖，吃过酒席千千万，没吃的酒席万万千，没有掏过一文钱！”众人拍手叫好。轮到县委副书记了，他说：“图章圆圆，笔头尖尖，审过的干部千千万，没审过的干部万万千，没

有一个合格的！”众人点头称是。轮到随从司机了，说：“方向盘圆圆，烟头尖尖，拉过干部千千万，没拉的干部万万千，没有一个办正事的！”县长不高兴，说不能这么看！众人都说，这是酒令，玩儿，往下说往下说。女秘书说了：“脸蛋圆圆，嫩手尖尖，陪过的干部千千万，没陪的干部万万千，没有一个正经的。”县长、县委副书记听到此处，脸都红了，又不好发作。友人说，这只是传说，据我所知，我们那个省的地方官员，还不能说都这么吃吃喝喝，都这么不办正事，都不正经，都不合格。但人们编出这新酒令，又把这酒令四处传播，却也事出有因，上述故事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古往今来名利观

□ 官伟勋

对名与利,历来就有着决然对立的看法。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是一种看法。然而,“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而已,何必利?”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古训。

它有点像性爱——人人需要,却又一直为正人君子或道学之士所羞于启齿。

到了我们的革命年代,“名利思想”几乎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们又一直在开展立功授奖运动。

一个时代的名利观,是一个时代物质基础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回顾一下它的过去,看看它的现状,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许多人以为孔孟是反名利的,这是误解。

《孟子》里有句话叫做:“食、色,性也”。

食与色是人的本性,名与利呢?即使不说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或必然延伸。前者是来自人的动物性,后者是来自人的社会性;前者是为生存与延续,后者是为了更“理想”更“惬意”地生存与延续。

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就十分看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孔子认为,人活一辈子,没有可称道的名声是最可悲的!“不患莫知己,求为知可也”。他又说,不要怕人家不知你的大名,能努力在可以扬名的本事上下功夫就可以了。他还说:“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意思是说,年轻人是可畏的,因为不知道他将

来会发展成多么重要的人物。但若到了四五十岁还没出名,也就不值得敬畏了。显然,孔子还认为成名不能太晚,晚了,过了成名的最佳年龄段,成名的希望就不大了。

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篇》)意思是说,在他那里学习三年,还不能做官吃俸禄的话,是很少见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不仅看重名,也同样是看重利禄的。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有人问孟子,古代君子也想做官吗?孟子说,当然。接着,他就举了孔子的例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安,就要带上礼品出国活动官做)孟子这样说,不是糟蹋孔子,是从君有志于治国安邦这一角度说的。孔子自己也一再说过:“学而优则仕”;“诺,吾将仕矣(我要做官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努力学习,就有官做了;“吾其匏瓜也哉?”我难道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匏瓜吗?有了合适的官,我当然是要做的!

名与利,特别是名,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十年寒窗为什么?不就为了“一举成名天下闻”吗?读书人太看重名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名是一个人“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的必要条件。对于利,司马迁更是最早承认求利是普遍人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的。“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王、侯尚且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看起来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然

而,班固正是因为这些观点,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指责司马迁的这些论点是背叛圣训,说他只是个只知崇拜势力与金钱的人。其实,这正说明司马迁能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

司马相如因无名而且穷,被老丈人瞧不起,决心去长安闯出名堂来。他路过成都成仙桥题字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表示不坐上四匹马拉的红色车子,就不回来了!在当时,坐这种车子就像如今坐“大红旗”、“大奔驰”一样,是高级官员、大富豪才可以坐的。他当年的这些大话,不仅没人嘲笑,反而被看作胸有大志的表现。

陆游在《夜游宫》里说的:“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既表现了求名的急迫,又表现了求名的执著。《长相词》云:“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反映了读书人既重名又重利,相较而言,更看重名的心态。明代有个“金榜题名”后的顺口溜:“起它一个号,刻它一部稿,坐它一乘轿,讨它一个小”,号和稿是名,轿和小老婆是利,生动地表达了士子们的追求。

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

自然也有不同的调子。李白在《行路难》里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少年行》云:“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只不过是在屡经坎坷、迭遭挫折后的消极情绪罢了,这并不能否认他一生对名的强烈追求。

名利不相等,然而相通

在旧社会流传很广的《神童诗》中有这样一段:“名题仙桂籍,天府快先登。萤窗新脱迹,雁塔早题名。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个快字,一个早字,一个双亲未老时,活脱脱表现出士子们急于早成名的迫切心情。

宋朝制度当上学士,就有一个穿红衣的小

吏给牵马,腰带可以绣金但没有“鱼”。再升一级入二府(汉为丞相与御史官署;宋为中书与枢密院),就有两个红衣小吏给牵马,腰带上可挂一个金鱼为饰,谓之重金。当时人们形容馆阁官员(相当今之县团级)急于晋升学士为:“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形容学士切盼入二府为:“眼赤何日两?腰黄几日重?”

名与利,两者不同却相通。名可以是利的阶梯,利可以为名开路。司马光说的:“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就是这个意思。

有了钱,就容易扩大知名度。《史记·货殖列传》载:在孔子的七十个学生中,最有钱的就是子贡。子贡“结驷连骑”(坐着四匹马并辔齐头拉的车子),每到一个国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讲,“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说孔子当时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是有钱的子贡在人前人后大力活动的结果。

古人有“士重名轻利,吏重利轻名”(《资治通鉴》7285页);“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庄子》)等等说法。道光皇帝在会见地方官员时也说:“捐班(指靠捐钱捐粮买官者)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指靠科举做官者)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仪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一经批评指点,就会改过从善)”。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把读书人太理想化了。“利之所在,皆为贲者(古代两个勇士),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总是人之常态。一般的读书人也不例外。

《杨朱篇》里讲:“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呢?“今有名则尊荣,亡(无)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名胡可去,名胡可宾?”有名才有尊严,才能享受,名怎么可以去掉,怎么可以抛弃呢?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怕有名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而又悔有名怕有名者,在史书上屡见不鲜。辛弃疾在《偶题》里

说：“人生忧患始于名”。白居易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声出去了，官做大了，出门结交的是名流，上朝则侍奉于皇帝身边，结果，“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程颐说：“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名言。”李萧远在《运命论》里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为人所熟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显然与它把由于优秀的品质与美好的名声所带来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关。

用俗话说，这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因为出名反而遭灾，甚至惹来杀身之祸者，不绝于史。于是许多人就对名利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苏东坡在《满江红》里说：“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酌，独吟独笑。”“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算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滞东风，眠芳草。”

晚清醇亲王写过一幅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够了。”（《文史资料》26期）这可以说是许多栽过大跟头、饱经世态炎凉的人所共有的心态。

《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书，在谈到朝廷时说：“在他们的统治下，盛大声誉比声名狼藉是更危险的。”可见，“入宫见嫉”，“功高震主”，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取决于国别，而取决于制度。在封建专制时代，“功高震主”总是一条铁的规律。《史记》里刘邦与萧何的故事就非常典型。刘邦要“御驾亲征”时，不得不让萧何留守并保证后勤支援。出发前，他特意给萧何加封并增派500卫兵。萧何自以为这是刘邦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很得意。一谋士却提醒他，这恰好说明刘邦对他不放心，说萧何已经离灭

族不远了。萧何惊问原因与对策？谋士告诉他，“君初入关，得百姓心，十余年矣！”你现在还在勤勤恳恳地争取民心，皇帝会怎么看呢？当今之计，你应赶快“自污”名声。萧何立即再三辞掉加封与增派的卫兵，同时大肆低价强购民田民宅，惹得民怨沸腾，纷纷告状。刘邦高兴了，萧何的地位也保住了。

绝对无视功利的思想家 是不存在的

一般史家都称孔孟为反功利主义者，称墨家是功利主义者。说墨家讲功利是没有疑问的，说孔孟根本无视功利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确是众多学者称儒家为反功利的典型论据。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孟子回答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其实，何必曰利，与反对利，是两回事。

《论语》说过：“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也被认为孔子是反利的。其实“子罕言利”的原话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能理解为孔子也反对仁吗？当然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应是，孔子不轻易谈利、谈命、谈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对于所谓“小人”，给他讲大道理，他不容易懂，用利害关系开导他，他反而容易接受。

《孟子·梁惠王上》篇与《滕文公上》篇，都一再讲到“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的问题。在《梁惠王章句上》里，孟子更明确地说道：“大王如要实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着手呢？每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周植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棉袄穿了。若都有力量饲养鸡、狗、猪这类家畜，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给他一百亩地，而且不去妨碍他生产，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这样做了之后，还不能使天下归附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这

不是讲功利,又是讲什么呢?至于他说的:“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及“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等等,都足以说明孟子既看重名,又看重利。

儒家告诫人们不要计较功利,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功利。也就是说,只有不去斤斤计较眼前功利,而是从某些更根本的问题上下工夫,比如说,让人民都懂得仁与义,都按仁与义的原则行事,整个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功利。

《淮南子·道应训》举过的一个例子:公仪休爱吃鱼,当宰相时,有人给他送鱼,他没收。他说:“我因为接受了你的鱼,而蒙受受贿之名,被免了相位,虽想吃鱼也就吃不起了。我不接受你的鱼,我就可以继续当宰相,靠自己的收入,经常吃到鱼。”公仪休不受鱼,不是不重利,而是不肯“沾小便宜”丢了更大的利。即所谓“廉吏久则富”理论。所谓儒家的反功利,其实也就是公仪休不受鱼的长功利久功利。

所有那些主张无为、兼爱、乐贫、无誉的思想家,都不能说是无视功利的人,应该说他们各有自己的功利观。他们是在说,只有按他们的主张行事,人类才能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

春秋战国以来,凡是法家都是倡导名利的,都是善于运用名利以治理国家的。《商君书·算地》:“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人在活着的时候,都在算计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对于死后,都担心自己死后的名声。如果种地能得利,老百姓就会用力种地。如果作战能出名,战士就会不顾死活地作战。这样做,对内能使民努力种地不荒地,对外能使民拼死与敌人作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能重用并切实落实法家主张的,基本上都收到了富国强兵之效。

健康的名利观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封建时代不讳言名利,但其名利观是有局限性的。

封建时代获取名利的途径很窄。一条路是

做官,再一条就是做文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曹丕:《典论》)

其实,着力于文章,也就是着力于做官。科举是离不开文章的。

封建时代的许多人,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一辈子都在摇头晃脑地吟哦,想在诗人名单上挤个一席之地以便名传千古的,的确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借此引起朝廷赏识与重用。

封建时代通向名利只有仕途这条独木桥。

“学好文武艺,货于(卖给)帝王家”。成名的路子窄,成功的目的更窄。做官的目的与“任务”就是效忠于帝王,为巩固帝王家天下的统治服务。而对发展农工业生产,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人,在封建时代的“正史”上,是很难占到一席之地的。小农经济靠的是经验,没有科技创造发明的需要与空间。“天不变。道亦不变。”帝王心目中的道,就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封建帝王只关心与其统治稳定有关的事物。

由于成名的出路只此一条,因此一个人的名声,就是对他人的威胁,尤其是对顶头上司的威胁。名声再大,像岳飞那样,大到天下到处欢呼“岳家军”的程度,皇帝也就深感不安了。这是专制时代压制人们的个性,使人们的聪明才智难得发挥的根本原因。

封建统治者,用封建道德作规范,用利禄作诱饵,用赏罚作手段,给天下英才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子,只允许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活动。它桎梏了名利观,也桎梏了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资本主义时代为人们获取名利创造了空前的机会与空间。

首先,它把个人获取名利看成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立志成名和富有,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反而是值得骄傲的事。从而在个人成名与得利这个问题上,收到了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的效果。其次,它为获取名利开辟了比封建小农经济时期无可比拟的广阔途径。除了公职外,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名成家,都可以发财致富。它为名与利的同一,创造了比较合理的机制。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凡是

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大得惊人的报酬,如像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样。这名与利同一的机制,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尽管如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却是严重的。这是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弊病。

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与发展人类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理应有更健康更明智的名利观。遗憾的是,旧的,或者说新瓶装旧酒的名利观,一直还在困扰着我们。名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扭曲,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整整缺着一个历史阶段——缺着一个把“名”(品牌意识)与“利”(经济效益)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有幸跨越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却无法回避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产生的种种矛盾。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没有一个漫长的近代史阶段,这是中国国情中的最大的国情。承不承认这一现实,会有决然不同的理念与决策。

中国自春秋战国贵族政治崩塌后,秦汉大一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后绵延延续两千余年,虽有改朝换代,基本制度却始终没有根本变化。

本世纪初,我们推翻了帝制,成立了民国。然而,临时政府于1912年到1915年改革的十五件事,也不过是限期剪辫子,劝说放脚,改变“大人”、“老爷”称呼,废除跪拜,禁赌,禁吸鸦片,以及一句保护人权和作风民主的空洞口号而已。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的毒素,基本上没有触动。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对封建制度一次非常伟大的革命。但,对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我们却缺乏有力的清算,且不说彻底的清算。

封建专制流毒给我们带来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够承认它,正视它,实事求是地对待它,我们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享用历史跨越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名与利,今日在我们社会,仍然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意无意地提倡“做了好事不留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觉得能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的人,是有的。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受习惯势力影响的结果。以至于做了好事不留名,舆论媒体到处找,成了我们社会的常见现象。

一个人们根本不在乎名声好坏的社会,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范仲淹说过:“举世不好名,则圣人无所用其权。”真是至理名言!再有本事的“圣人”,也没办法治理一个人人不好名的社会!

一种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应是人们勇于做好事,勇于承认自己做了好事的风气。

希望成名成家,是好事。只要不是通过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名利,都应当受到赞赏鼓励。“名与善相维(把好的名声与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去名是去善也。”反对成名就是反对人们做好事。“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名不能使人尽善尽美,但可以鼓励人们向好的方面努力。古人尚且知道利用名以治国的道理,我们唯物主义者更应充分发挥名的积极作用,为人民造福。

名与利应是同一的。目前在我国,似乎只有歌星、影星或“主持星”,可以说名利也大,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包括一些在尖端科技领域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了。这对我们国力的发展与提高是很不利的。

社会主义的个人名利观,总是直接间接与集体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人人具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名利观,不仅会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会使整个国家更加充满活力,获得更加全面更加迅猛的发展。

一切有识之士,尤其手里执掌媒体实权的朋友们,应为改善我们的名利观,为力求名与利的同一,作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正有幸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责任编辑致中)

评诸葛亮用人与 魏延之悲剧

□ 徐澄清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据、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

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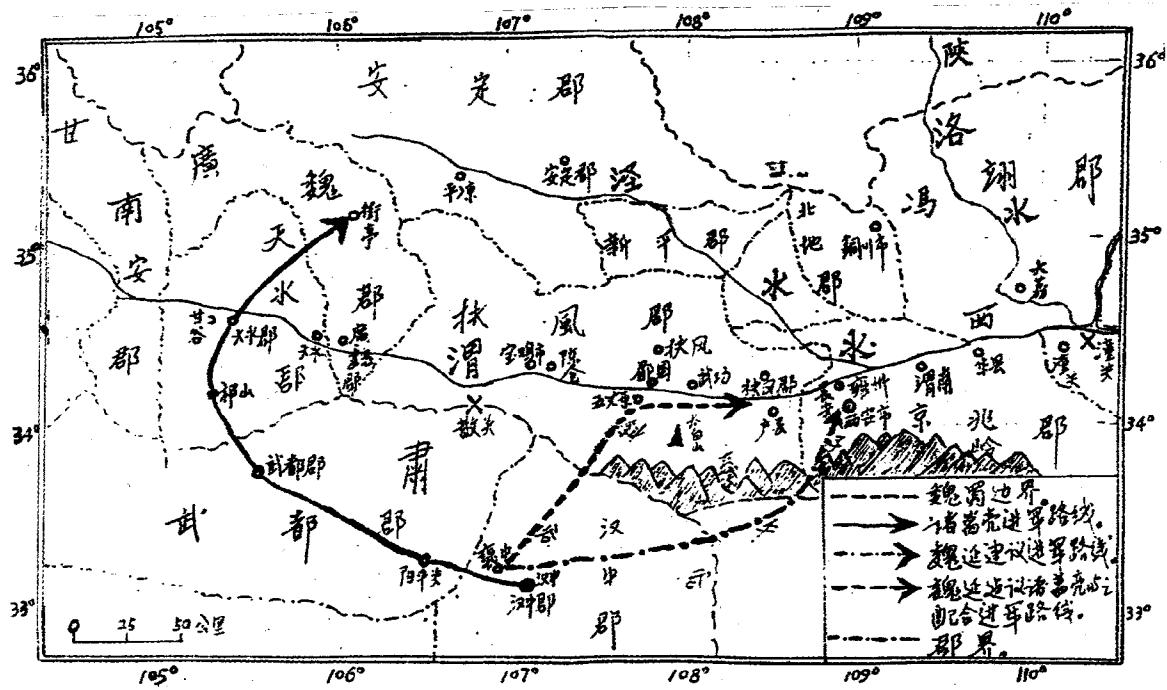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

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

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



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璋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这个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事后诸葛亮虽作了“自我批评”，请将自己贬为

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虑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法偏颇是一个重

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暎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璋，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已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

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法偏颇”，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暎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已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暎、护军姜维等作身死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

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瞭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瞭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

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瞭说：“往者丞相亡歿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瞭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瞭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责任编辑 吴思）

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 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 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党史信息报》

2001年全新改版

全年定价：28.08元

四版扩八版 百年风云看个够

党史信息报

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

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展示

党政干部学习工作的助手

史学工作者重要信息渠道

离退休老同志的良师益友

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园地

CN31-0089

邮发代号：3-91

以全新视角 再现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以全新姿态 展示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文化奇人张伯驹

□ 王晓飞

在中国现代老一辈的文化名人中,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贵胄子弟 钟情文化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1917年张勋复辟,他又参与其中,任内阁议政大臣,为此获罪下狱。出狱后便离开政界,全力投身于金融事业,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捐资创办香山慈幼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

任过提调参议。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多有往来,但他从不趋炎附势。正是在同高层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官场内情,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

退出军界后,张伯驹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他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一方驰骋的天地,各种古书典籍陪伴他送走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张伯驹的“不务正业”,使其父张镇芳放心不下,他临终前握着儿子张伯驹的手,断断续续地对他说:“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张伯驹含泪应允,但当父亲故去后,仍然痴迷于自己热衷的文化艺术活动。

父亲生前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并为银行投资20万元,任董事长一职。死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对此却毫无兴趣。后来在母亲的百般相劝和苦求下,才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母亲实指望他继承父业和财产来振兴家业,可实际上,他只是挂了个董事长名,很少过问银行之事,而专爱书画、戏曲等艺术,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的诗词著述颇丰,京剧艺术造诣很深,经常同

当时的名家登台演出,不仅轰动京城,而且影响涉及全中国。

情系国宝 抛金藏珍

张伯驹不愿经营父业,却对中华民族的瑰宝收集事业视如生命,他向前人请教鉴赏古迹真品的真谛,同时又不惜重金购入古代珍品字画,有时竟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

张伯驹从 30 岁(1927 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 60 岁(1957 年),前后整整 30 年。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 118 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30 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这是中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帖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 60 多年。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他托人找到藏有此帖的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絮,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 20 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 6 万元,以便待机购买《平复帖》。1936 年,他听人说溥心絮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深恐转徙国外,就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主政的宋哲元不计该画出境,但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

张伯驹惟恐《平复帖》也遭此厄运,立即请中间人韩君往商于溥心絮,恳请勿再使此帖流于国外,并请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 6 万元大洋成交,但溥心絮未允。

1937 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春节前夕,听得溥心絮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 4 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张伯驹欣喜若狂,

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 30 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厉声拒绝。

1941 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 300 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 8 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 40 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届时,张君棺木将放置在你家门前。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 40 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北京从金代定都到清末溥仪退位,历时近 800 年,皇宫内苑荟萃历代奇宝异珍。溥仪被赶出北京城时,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宫中嫔妃及权臣也趁机偷走大量古玩字画。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文物和古玩字画陆续出现在市面的古玩书画店中。张伯驹根据《故宫藏画目录》考定,在所失散的 1198 件书画中,有精品 400 余件,如按当时价格收购,不需要太多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张伯驹据此一再向有关方面呼吁,建议国家拨专款将这些国宝收回。但是南京政府此时正忙着打内战,根本不肯拨款,使这些国宝大多进入古董商人之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准备将一些稀世珍品运往上海,出口到国外去谋取暴利。消息一经传出,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

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

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谋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

马霁川特别晓得张伯驹的脾气，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爷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 800 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爷您了。”

张伯驹深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少得可怜，故宫也不可能出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

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

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 220 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防止奸商变卦。

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只好忍痛割爱，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 13 亩的房院出售，凑够 220 两黄金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 20 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张伯驹又气又

急，夫人见他愁眉不展，坐卧不安，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 20 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了却自己心中的夙愿。

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 240 两黄金买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 500 两黄金，求兄让出。”

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 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连正常的维修经费都不能拨给。他把怒气压在心头，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旧中国，张伯驹为了不使真迹国宝流失国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珍品字画，他先后收集数百件文物珍品，终于以文物收藏鉴赏家而闻名于世，饮誉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燕京大学艺术史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1956 年，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决定发行公债券，文化部开专门会议动员文化界人士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先是部长茅盾带头，自报了 5000 元公债，夏衍副部长报了 4000 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 8000 元。散会后，大家三三两两往回走，张伯驹思潮起伏，心情难定，他想了许多许多，最后同妻子商议决定为了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不久将珍品全部送到文化部办公室。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写道：

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

《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文化部长 沈雁冰

1956年7月

当时，国家作价2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金，但张伯驹分文不要，其高尚的爱国精神震动整个中国，赞誉声鹊起。

1957年在康生等人的迫害下，张伯驹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停职、检查、各种罪名接踵而来，使他无法从事自己所酷爱的文化事业。不久，陈毅元帅知道了他的磨难，经元帅介绍，他被吉林省文化厅邀请去参加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远离了“反右”斗争的漩涡之地，又得到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的大力支持。张伯驹如鱼得水，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对文物的收藏、整理、鉴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全部地毫不保留地贡献出来，使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出现了非常可喜的景象。他一方面对馆藏文物书画作品重新进行整理鉴定，教授年轻同志文物知识，培养业务骨干；另一方面，为丰富博物馆藏品数量，组织人力，抽调人员对历代书画、文物进行寻找和挖掘。

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张伯驹还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三十多件书画及文物作品捐献出来，其中许多作品极为珍贵，有一些属海内外孤本。70年代张伯驹还曾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是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的脂砚斋的文物。一些稀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如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宋赵伯《仙峤白云图》卷等也都捐献出来。

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物搜集和整理工作停止了。吉林省“文化界黑司令”宋振庭被揪了出来，由此，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

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等等，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了。多得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的无数次批斗，更加强了他的钢筋铁骨，他小心珍藏着陈毅元帅书写给他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条幅，坚定自己活下去的决心。出于对古代字画的酷爱，即使在被关押监管期间，他也不忘保护名贵字画。有一次张伯驹去造反派那里请示工作，见屋地上丢了許多烂纸，墙角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二尺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张伯驹一下子愣住了，认出那是宋朝米芾的作品。他的真迹，明清时已不可多得，称得上是奇珍。如今却像烂纸一般扔在那里，地上那些撕碎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张伯驹心疼这些无价之宝被毁坏，他怕那乾隆皇帝亲笔写的“南宫墨宝”的米芾作品又被红卫兵小将当作引火之物，趁屋内人不注意，卷好后放入烂纸筐内，由劳动改造打扫卫生的宋振庭当作废纸带了出来，使这幅稀世珍宝免遭厄运。

“文革”期间是张伯驹内心极度苦闷的时期，他在此期间写作的诗词中说“机心常懔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见愁”。发出“只解风流不解禅，行云流水送余年，忍将泪眼对江山”的喟叹！

痴迷京剧 造诣超群

张伯驹自幼便喜爱京剧，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那时，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鑫培）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是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引荐，当时张伯驹继承父业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平素的业余爱好就是醉心余叔岩的京剧。结识余后，便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书房来作客，余叔岩的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银行。偶尔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时，张伯驹便

为之垫付,等余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余叔岩对张伯驹在财务上的支持是十分感激的。又由于张伯驹学演余叔岩的戏,是一个十足的余派票友,二人频繁往还,除京剧外,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张余二人也有共同爱好,因此促膝谈心,关系非同一般。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有时来到余家,一言不发,不论余叔岩是在吊嗓子,或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友人谈戏,他都在旁静听。凑够了时间,他招呼也不打就走,不但余叔岩本人,连一般去余家的朋友,对他这种对人不寒暄不讲话的态度,日子久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艺的时候,才请余叔岩指点。余叔岩教戏也是很保守的,就是对他的徒弟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人,说戏也是很少的。但他对张伯驹却另眼相看,从张伯驹31岁学戏开始,十年光景,张伯驹竟学有40多出戏。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1937年春,正值张伯驹40岁生日,余叔岩倡议以演戏形式庆贺,又因头年河南发生旱灾,张伯驹表叔李鸣钟将军也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决定在当时京城最大的隆福寺之福全馆演出。

张伯驹平常演戏,观看的人就很多。这次饰演《失空斩》之主角诸葛亮的消息传出后,不仅轰动了北京城,而且轰动了全国。除了北方的张氏友好纷纷送礼拜寿,主要为听戏以外,不认识的人也都想法去拜寿听戏,甚至远在上海的张氏戏迷也远道专程来听这出戏。福

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当时报纸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大轴《失空斩》一开戏,便掌声雷动,叫好声接连不断。张伯驹饰诸葛亮,其他配角也都是显赫一时的名伶,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璋,个个身怀绝艺,赞誉一时。张伯驹一出场便赢来个满堂彩,念引子有彩,“两国交锋”那一段原板有彩,“此一番领兵”那一句,张伯驹在“兵”字这里用了余派传统的巧腔,照例赢来喝彩声。以后几场戏更是彩声不断,直至场终。这场《失空斩》张伯驹确实是铆上了,不但一句不苟,而且每字不苟,搏狮搏兔俱用全力,用心用力,腔、调、字、韵无不考究,真个是造诣高深,技艺超群。

张伯驹以演过这一出空前绝后大场面的《失空斩》而驰名全国,他曾为此写下诗句:“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尽五峰”。更有趣的是,当年谭鑫培曾陪余叔岩演过王平,而如今余叔岩又陪张伯驹演王平,堪称梨园一佳话。

张伯驹不仅向余叔岩学习余派京剧,还博采众长,向钱金福、王长林学习武生戏,以补自己演艺之不足。为了演技迅速大增,后来干脆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随时咨询,像这样对艺术刻意追求的人,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

为了弘扬京剧事业,1931年张伯驹还同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国剧学会。募得各方捐款5万元作基金,张伯驹任学会审查组主任。举行开学典礼之日,晚间演剧招待来宾,大轴合演反串《元蜡庙》。梅兰芳饰褚彪,张伯驹饰黄天霸,其余角色也都是反串,这是梅兰芳演戏以来惟一一次带髯口的演戏。国剧学会成立后,因常有演剧和教习任务,张伯驹又多次同梅兰芳等名角同时登台演戏。

诗词超逸 书法见工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7岁入私塾，开蒙的便是中国古典传统经书，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著作。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如《如梦令》“寂寞黄昏庭院，软语花荫立遍。湿透凤头鞋，玉露寒侵苔藓。休管、休管，明日天涯人远。”这种凄感情词，贯穿他的词作始终，是他有感于人生的巨大变化而发自心肺的真音。这正如他在《雾中词》自序中写的那样，“杜工部诗云‘老年花似雾中看’。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

张伯驹又说：“情来兴至，更复为词”，因而他对人间的真情是非常珍重和爱惜的。特别是对自己钟情和景仰的人，更是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他惊闻陈毅元帅病逝，万分悲痛，撰写诗词以志悼念，诗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还撰写了一副挽联追忆陈毅元帅。联云：

“仗剑以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挽联用张伯驹特有的鸟羽体书法书写，写得飘逸、洒脱、袅娜多姿、饶有画意，这副从内容到书写都有特色的挽联挂在陈毅元帅的灵堂前，引来众多人的驻足观看，当时抱病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在挽联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仔细吟咏，观摩着飘逸的书法艺术，然后，悄声地对身边的张茜说：“挽联写得好，书法也很好。”备加赞叹后，他又询问张伯驹同陈毅的关系，张茜回答毛主席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并告诉毛主席说：张伯驹晚年遭遇凄凉惨苦，现在刚刚从东北长春回来，还没有工作和户口。毛主席听到情况后，立即嘱托周恩来总理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就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张伯驹虽已年迈，但他仍精神矍铄，以忘我的精神工作着，他著书立说，筹划并组建韵文学会，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全力从事台湾回归祖国等公益事业，直到去世前夕，仍不忘祖国的统一，高尚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使人铭记在胸，永不忘却。

1982年2月的一天，张伯驹病重住院，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赴美之前，受爷爷嘱托专程来医院看望张伯驹，张伯驹挺着病躯，口述一首七律《寄怀张大千》和一首《鹧鸪天》词，托张晓鹰转赠给挚友张大千，七律诗云：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填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方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诗中以赤子之情，表达了对祖国的一片忠情，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溢满诗表。

张伯驹这次住院不久，终因年事已高，于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责任编辑 吴思）

中共党史人物丛书的来历

□ 李传根

二十年前，陈志凌等一批中青年教师发起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那时起，他们克服无专门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门经验的困难，遵照司马迁《史记》体例规范，撰写出《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1—70卷，1800万字。该书计划出100卷，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应运而生

1979年3月25日，湖南省师院、华中师院、华南师院、重庆师范学院等18所院校的党史教师，在郑州大学讨论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问题。事情缘由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学要普遍开设中共党史课，但是许多老同志被打倒还未平反，陈志凌在备课时碰到讲什么的问题。他考虑能不能从研究党史人物入手，突破禁区？他建议和全国高校同行们联合起来，研究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了校领导和同行们的支持。陈志凌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市高等院校联系，倡议全国高校联合起来，讨论党史人物，写他们的传，为讲党史、军史、革命史课提供统一、可靠的材料。郑州这次18所院校代表的聚会，就是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筹备会。

这次会议主要办了起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草案）、委托郑大派人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确定当年年底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五件事。陈志凌、周文顺到北京高教部、社科院等单位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让办公厅两次写信称：“你们

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这个积极性是好的。希望你们扎实实地做好编纂党史人物传记工作。”

陈志凌前往采访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时，何老连声称赞说：“好好。这项工作很重要，但已经晚了些，搞迟了！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搞。”

1979年12月4日至18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广州矿泉宾馆隆重举行，201人参加会议。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宣传部长等8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推选出何长工为会长，李新、胡华为副会长，陈志凌为秘书长。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接见了部分代表。他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后拿出更多的成果来。杨尚昆还接见四川的代表。他介绍了中共在四川早期发展斗争的情况，回答了代表们问杨森公（尚昆异母兄弟）入党时间等问题。李鹏母亲赵君陶在寓所热情接待为哥哥赵世炎、丈夫李硕勋写传的作者彭承福、何锦州、李荣等同志，讲了李硕勋28岁就壮烈牺牲的情景。李硕勋牺牲时李鹏才3岁。后来李鹏读过父亲《李硕勋》传后，接见作者表示感谢。

蜚声世界

1980年7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和读者见面了。秋收起义总指挥是谁？我们从中看到是卢德铭。



1984年5月,会长何长工(右)和王首道(左)在人物研究会上

书中为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无产阶级理论家肖楚女、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张子清等10位革命烈士立传。首卷第一次印刷332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3、4、5卷相继出版,被海内外誉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人物传记丛书。”应读者的要求,第1卷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139000册,创该丛书的最高记录。

1981年4月在重庆举行中共党史人物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交流经验,落实人物传编写规划。何会长提出用8至10年时间,编写出版500名党史人物的号召,得到了与会者赞同。

1985年4月5日,《信息汇报》报道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后引起国际注目,美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朝鲜等三十个国家先后翻译出版了这套丛书。

为什么这套丛书如此受欢迎?因为资料翔实可信。如杨明斋在1920年以译员身份随维经斯基到北京、上海参与中共组建工作。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他在1929年以后的活动,国内却无人知道。传记作者、山东石油学院教师余世诚,为了把杨明斋坎坷的一生弄个水落石出,多次与苏联联系,终于在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总

书记的关照和苏联学者的帮助下,查清疑难问题。原来早在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了”。苏方还告知:“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这些)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都很关注《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出版工作。陈云为《中共党史人物传》题写书名,并为《任作民传》题词。

邓小平给《李子洲传》题写书名,为《阎红彦传》题词。李先念、徐向前分别为《皮定钧传》题词。胡耀邦向党史人物研究会推荐《黄定荃传》初稿。

壮志未酬

正当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健康顺利地发展时,88岁的何长工会长去世了,66岁的胡华副会长也去世了。胡华从1982年到1987年主持了在镇江、长春、北京、杭州等地召开的共14次审稿会,每次会上经过复审筛选给他终审的书稿达50万至70万字。他在审稿会的半个月内,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仍不能全部完成,只好把大量复审稿带回家中终审。他患病住院1个多月,审阅文稿百万字。1987年12月14日,胡华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呕心沥血不幸早逝的何止胡华一人。有位甘愿清贫,花费多年业余时间,撰写出中共党史人物《施洋传》、《吴焕先传》的编审者,1982年8月,病死在吉林审稿会上。他那晚挑灯夜战,第二天早晨,同行不忍心叫他早起,早饭后,却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枕边还放着未改完的传稿。他就是年仅46岁的湖北财经学

院教师廖鑫初。

西北农学院张守宪，用业余时间和齐心、胡新民等同志先后分别合作撰写了中共党史人物《何挺颖》、《刘志丹》等 22 篇传记。他积劳成疾，不幸于 1996 年早逝。

1991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共党史人物传》50 卷出版座谈会和首发式。何长工等成千上万名同志共同奋斗的成果终于问世了。《中共党史人物传》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吴玉章奖金史学一等奖。

1991 年 9 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出名誉会长邓力群，会长李力安，副会长王淇、陈志凌（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意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挂靠在党史研究室，并批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1—100 卷编纂规划》。

1994 年 6 月 9 日，李力安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座谈会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1—55 卷首发式。顾问们就编写出版党史人物传的经费问题争相

献计：一是呈报国家财政拨款；二是申请中组部拨一笔党费支持；三是争取爱国企业家赞助；四是分散捐助，争取传主单位提供经费。

会后，理事会决定在前三种筹措办法暂难实现时，采取后一种办法，即建议各传主单位提供经费。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首先响应，筹划了部分经费支持写传。航天工业总公司、地矿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湖北、安徽、江西、海南、辽宁大连、大庆石油总厂等地区和单位也积极支持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研讨会和审稿会。两个公司还赞助了 400 万元。研究会决定以 400 万元为基金，1993 年 7 月 16 日成立了中国现代名人研究基金会，基金会对为编写人物传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

（责任编辑 吴思）

作者补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 6 期发表的我写的《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经进一步查证资料，文中“林彪派张云生……”（该期 12 页右栏 19 行）是对的，我在贵刊第 10 期 39 页关于此点的更正有误。谨此补正。

陈虹

冯玉祥扫贪碑的曲折经历

□ 翟智高

河南省伊川县平等乡平等村董光涛家中珍藏着一块石碑,碑文全文如下: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 我们誓为人民建立极为清廉的政府 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 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 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冯玉祥

中华民国十六年

平等县县长 路尔宏 立

董锡乐 书

这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碑文,在经历了七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仍然完整如新。围绕这块碑的建立、拆除、失落、保存,有着曲折的经历。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河南省政府迁往洛阳,洛阳成了河南省省会。白沙和大莘店是洛阳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个地方,是扼守东南颖、淮、宛、荆,北达洛阳,西去秦、晋、甘、青古道上的咽喉要冲。民国十六年五月,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决定在白沙、大莘店新建两个县,将白沙命名为“自由县”,大莘店命名为“平等县”。

平等县首任县长路尔宏请冯玉祥为新建的平等县题词,冯玉祥挥笔书写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针对当时官匪勾结,土匪横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法无天,百姓处于水火之中的

情况,冯玉祥发出要把它们“扫除净尽”的誓言。

平等县政府请大莘店书法最好的董锡乐先生将冯玉祥写的碑文书刻于石碑上,立在平等县府。

是年,反封建、反迷信、妇女放足、禁烟禁毒、惩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土匪等全面开展起来,冯玉祥的碑文鼓励了民众,同时像利剑一样直插土豪劣绅反动恶势力的心脏。他们不甘心灭亡的命运,不惜勾结宜阳花山寨的土匪来攻打新成立的平等县,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平等县县长路尔宏率部与土匪作战,由于土匪势大,路尔宏被俘,被关押在花山寨。

平等县县长被俘,地方恶霸乘机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土匪来打大莘店是因为冯玉祥设了平等县,冯玉祥不让我们过,他的平等县也弄不成。还说,只要平等县政府在,土匪还会攻大莘店。于是平等县人人恐慌,土绅富户怨恨平等县府设在这里。恶霸流氓多次胁迫平等县职员拆除冯玉祥石碑,并肆意到县府闹事,使县府工作瘫痪。

国民政府在不知路尔宏死活的情况下,又任命周斌为第二任平等县县长。当这位县长带着委任状到大莘店平等县府任职时,地方恶霸许金寿找到周县长说,路县长的下场你还没看到?你要是想要命,就赶快离开这里。新任县长

吓得跑回省府,坚决辞职不当平等县长。

于是,省政府又派尧何年接任第三任平等县县长,尧到大莘店后,了解到周斌辞职的原因,还有点不太相信。中午他去吃饭,饭后回到县府的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内包一粒手枪子弹,纸上有一行字:“你想扫除我,我先铲除你。”吓得尧何年不敢接任,就携带平等县的县印跑回了洛阳,自此平等县全面瘫痪。

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进行中原大战,白沙、平等县成了战场,当地老百姓为了保护这块碑,就悄悄地把该碑埋于地下。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洛阳,相中洛阳为历代王都,决定把南京国民政府迁来洛阳。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以洛阳为行都,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洛阳改为国民政府行都,但洛阳南龙门外的平等县却因土匪恶霸横行而陷于瘫痪,对行都安全不利。时在洛阳的国民党二十路军军长张钫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并派该军王凌云部三个营到平等县剿匪,但仍无法制止地方恶势力与土匪勾结横行,匪首郭世法率众匪洗劫平等县鸣皋镇,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还抓走150人作肉票。土匪放出话来,只要政府不侵占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会与政府过不去,言外之意是要国民政府撤销平等县,退出他们的势力范围。

按历史惯例,一个地方县府治所位于该地区中心地区,平等县府在大莘店,而大莘店正是土匪的势力范围。

然而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对距洛阳仅30公里的平等县所发生的事竟采取退让的政策,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冯玉祥在平等县所立碑的碑文太富于刺激性,过于革命化,不然怎会出现三任县长干不成的事。

但洛阳南大门没有县府,也太不成体统,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八月,国民政府撤销

平等、自由两县,合而成立一个新县,以古籍文献所记商代“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定名为“伊川县”。所辖区为原平等、自由两县的范围。县政府所在地向北移7公里,设于窑湾“嵩洛桥”以北的府店街,这里属洛阳辖区,距洛阳龙门仅有十多公里。花山寨上的土匪一般不会“越界”行事,大莘店的土豪恶霸也不敢贸然到府店滋事,就这样,新成立的平等县仅有五年就夭折了。蒋介石的退让政策使冯玉祥“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的誓言变成了一碑空文。

又过了26年,解放后的1958年大炼钢铁,大莘店建了一个炼铁厂,因需石灰石作原料,就把各种石碑搜寻来砸碎入炼铁炉,一场大雨后,埋入地下的冯玉祥碑露了出来,有人把碑挖出送到炼铁厂,大铁锤砸下碑边,人们发现碑文是革命词句,就停下来。这时,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立的碑,毁了算了,工人们说,不管谁立的碑,上面的话说得好。碑幸免于被砸,又被掩埋于地下。

1974年,平等村董光涛挖土挖到了冯玉祥碑,就请人帮忙把该碑拉回自己家中,一直保存到现在,在国家文物局开展征集百年文物的活动中,冯玉祥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责任编辑 吴思)

作者来信摘登

感谢贵刊今年第10期发表《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一稿,刊物第9页倒数第17行,罗瑞卿同志被撤职的叙述,请更正为:

“……罗瑞卿被撤掉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军内一切职务。”

章学新
谢景星

五十年后重访志愿军 战俘营

□ 张泽石

今年6月,我们在京的几位原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应北京电视台《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剧组的邀请,前往韩国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关押过志愿军战俘的地方去拍片。《当祖国召唤的时候》是北京电视台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拍制的六集专题片,主题是弘扬我志愿军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一集专门反映我们六千坚持回国的难友当年在战俘营的爱国斗争。

我们正好是在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即2000年6月25日的次日启程前往韩国的。坐在飞往釜山的飞机上,我真是思绪万千。当年入朝作战、失利被俘、奋起斗争、长期监禁等等经历又一幕幕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巨济岛上的腥风咆哮、海涛怒吼又在耳边响起。岛上那座“最高监狱”还有么?济州岛上的烈士墓地还在吗?当年我们是带着伤病被押进釜山的,那时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半个世纪后竟会坐飞机重访这块伤心地……

据事先了解,原坐落在釜山的战俘营已荡然无存,而巨济岛却在原战俘营营地上建立了一个“战争博物馆”。到达釜山后,我们便首先去了巨济岛,我们是坐汽车通过跨海大桥登上巨济岛的。沿途到处是漂亮的旅游景点,高大的工厂厂房,豪华的花园别墅,比起当年那荒凉而又阴森的景象,巨济岛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到了当年关押中国战俘的第71号、72号、86号等营场所在的那个山沟里,果然见到了那个“战争博物馆”。馆内有展出实物的展览

大厅和播映当年战俘营资料片的放映室;展厅大楼外有当年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留下的营房、弹药库、“最高监狱”等石砌建筑物的断垣残壁;更有一座相当逼真的战俘营营场模型。整个展览和解说词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剧组的摄像机伴随下,我们一面参观展览一面述说当年大家在战俘营的遭遇和抗争。我们着重回忆了1952年4月8日美方强行对志愿军战俘进行所谓“遣返志愿甄别”的情况,讲了当时“71号营场”为鼓励难友坚决回国升起巨济岛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镇压的流血斗争经过和敌人在“72”号集中营里怎样制造白色恐怖胁迫难友拒绝回国,以及林学通、阳文华怎样站出来号召难友回国而壮烈牺牲的事迹。站在那座“最高监狱”门口,我还介绍了“四八甄别”后扣押敌酋杜德将军的斗争。“杜德事件”后,我和孙振冠曾与“战俘代表团”其他朝鲜人民军战俘代表一起,在“最高监狱”坐了三个月牢。我深感遗憾的是孙振冠已不幸于两个月前去世,不能由他来述说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济州岛,当年荒凉贫穷的济州市已变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城,而我们的座机降落的那个规模不小的现代化飞机场正好是当年关押我们的“第八战俘营”营场所在,真是沧海桑田啊!站在那里,看着周围富丽堂皇的建筑群,我们有感于和平之可贵,有感于韩国人民半个世纪来的勤奋建国热情。但在我们眼前也呈现出1952年10月1日敌人血腥镇压我们升国旗时的火光硝烟和护旗勇士

们赤手空拳与敌人英勇搏斗、56位难友当场壮烈牺牲的情景。我们急忙租车去寻找当时埋葬烈士们的墓地。幸好姜瑞溥战友还记得当年他作为一个营场的战俘代表去墓地参加悼念烈士的经过。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在济州岛西南角的“摹瑟浦”海边,找到了那片背靠陡崖面向大海的烈士墓的遗址。我们流着泪向烈士英灵献了鲜花,我在悼词中说:“亲爱的战友们,原谅我们吧!我们不该过了半个世纪才来看望你们。但是,我们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啊!几十年来大家都沒有忘记也不敢忘记你们!忘了你们就是忘了我们共同战斗

的青春岁月,就是忘了我们对祖国的忠诚!在我们面前的这济州岛的青山、济州岛的大海都可作证:你们当年正是为了祖国的尊严,才将自己的鲜血洒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你们的忠骨才被埋在这座太平洋的孤岛上……”最后我们含泪将百余朵鲜花投进了怒涛澎湃的大海,了结了我们六千难友一桩几十年的心愿。我们听着那汹涌海潮的阵阵轰鸣,感到那就是烈士们的英灵在呼应,使我们久久不忍离去……

第三天我们从汉城去参观了板门店。我们站在停战谈判那张谈判桌前,回顾了当年双方代表为战俘遣返问题进行的激烈交锋,回忆了我们为支持我方代表所开展的顽强斗争。站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山坡上,我们还望见了山洼里当年曾经竖过那座“祖国怀抱”牌楼的遗址,想起47年前我们带着满身伤痛通过那座牌楼扑向祖国怀抱时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感受到:在我们心中,“祖国”的光辉是如此强烈,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狂风暴雨,也未能减弱她的光芒!啊,祖国!我们虽然已经老了,如果再有人胆敢侵犯您,我们这些老战士还愿为您献身!

从板门店返回汉城时,这座拥有1400万



我们流着泪向烈士英灵献了鲜花

人口,十分整洁、安定、繁荣的城市已是华灯初上,整个汉城成了一片灯的海洋,架在汉江上那十几座大桥如同十几条悬空的长虹光彩夺目。从大桥向汉江两岸延伸出规划整齐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街心则流动着由小轿车的彩灯形成的辉煌长龙。啊,昔日那硝烟弥漫、残破不堪的汉城哪里去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还可感受到前不久南北方高峰会谈带来的喜庆气氛。我不禁怀念起当年在战俘营与我们生死与共的朝鲜战友: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还好么?我们多么希望你们的祖国早日统一、早日骨肉团圆,我们衷心祝愿兄弟般的朝鲜民族从此生活在和平、友爱与共同富裕之中。

翌日清晨,韩国航空公司用波音747客机将我们送回北京,在飞机上,我总觉得像是在做梦,难道我多年来一直做着的重访韩国为烈士扫墓的这个梦真地实现了?听到广播里说北京已经到达,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表原来从汉城飞到北京还用不了两个钟头。但半个世纪前我们被关在战俘营时,总觉得被云天大海隔开的祖国是那么那么遥远……

啊,祖国,您的儿子出去圆了一个梦又回来了!

(责任编辑:文 贤)

忆访李大钊故居

□ 林 田

前时阅报，知坐落于河北乐亭县新城区的李大钊纪念馆建成两年多来，已接待前来瞻仰、参观的中外人士数十万人次，每逢“4·28”李大钊殉难日及一些节假日，都有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来此进行悼念，说明我国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始终活在人们的心里。由此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访问李大钊故居时的情景。现在借助当日的笔记，我把能忆起的访问中的见闻和感想写在下面。

那是 1988 年 4 月 23 日，北方春天中一个明丽的日子，我们乘车从乐亭县城出发，东行十多公里，见田野中出现了一片片正开花的果树幼苗和有水泥柱的葡萄园。陪同我们的县委宣传部的老刘同志说：“大钊故乡——胡家坨乡大黑坨村马上就到了！”他还讲到，这一带的农民接受新事物快，改革一开始就改变了单纯种粮食的老规矩，发展起果树来了。

我的老家在城北，离大黑坨 40 里。我最早知道李大钊，还是少年时听我的大哥讲到关于李大钊的一个小故事：李大钊在北京当了大学教授，开始妻子儿女仍住在乡下老家，冬天他的孩子们到村外树林里拾枯枝当烧柴，小手冻得红肿裂口。当同乡去京向他说起他的孩子们在老家生活很苦时，他说：“小小年纪受点苦的好！”这句简单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年轻时一直认为多吃点苦是好事。当时，家乡群众还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知道他很有学问，是为救国救民被反动派杀

害的。大家都很同情他，尊敬他。提起他，都不称姓，而亲切地直呼为“大钊”。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回故乡瞻仰大钊故居，这次始得如愿以偿。大黑坨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一条村街横贯东西，两旁是错落不齐的砖墙、土墙或秫秸篱笆的农家院落。大钊故居在长街的中间路北，青砖墙黑漆大门的院子和砖瓦房舍，据说是按故居原样重修的。院子有二进，大门内二门外有东厢房，是大钊幼年在私塾读过书的地方。二门内有东西厢房，东厢房是大钊的父母住过的房子。正房六间，靠东面三间是大钊大祖父的住室。大祖父无子，大钊父亲自幼就过继给了大祖父。大钊一岁时父母双亡，就是这位大祖父抚养了他，小时随大祖父住在东正房。现在这房子靠东面一间的炕上放着一对樟木箱，是大钊在 1924 年去广州参加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买了两箱书带回来的，这是故居中惟一的大钊遗物了。墙上镜框里有大钊及夫人赵纫兰的照片。早年当地有男孩早婚风俗，大钊 11 岁、赵纫兰 17 岁时结婚。夫人极贤慧，初时如姊妹关爱小弟一样照顾他，大钊懂事后欲外出求学，夫人全力支持。大钊在永平府（府治在今卢龙县）和天津读书时，就全凭夫人在家辛苦经营数十亩土地与典当挪借供给。1927 年大钊牺牲后，她又含悲茹苦抚养教育子女，至 1933 年参加大钊葬礼后，饮恨谢世。家乡人至今对她也备加称赞。从照片上看，夫

人端庄秀丽，一个老式橱柜上摆着她留下的穿衣镜和掸瓶，亦古朴典雅，联想她和大钊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故居后院一分为二，东院原属大钊家。院内有一小杏树，杏花刚谢。杏树下葬有大钊女儿李星华的骨灰，这是按她生前遗愿由她的丈夫贾芝送回葬于此处的。一小石碑上记载：星华16岁与父同时被捕入狱。父殉难后，星华当时不在，星华协母负起生活重担。1932年她加入中国反帝大同盟，并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次年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家及父亲生前好友、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将父亲灵柩葬于万安公墓。1940年她赴延安，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从事教育及民间文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忧郁成疾，但从未向恶势力低头，1979年逝世。贾芝葬妻时写了深情的献词镌于碑上。词曰：

杏花报春枝头开
党的女儿今归来
傲骨铮铮凌霜雪
血泪成篇有余哀
浩劫十年君何苦
丹心百折终不改
独立苍茫朝复暮

身依碣石望蓬莱
读之使人心楚。

走出故居，隔街对面，有一幢建筑简朴的平房，这是故居纪念室。室内陈有大钊《狱中自述》真迹影印件，笔力遒劲，文词凛然。临危之际，他仍以一国民党人之身分（大钊为保守党的机密和掩护同志，始终未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而只承认是国民党员），慷慨陈述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扼制之历史和争取民族解放之方略，其忧国爱民与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之情，令人感慨不已。

纪念室中还有一幅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时与教员、同学合影的照片。中间一高个儿青年为英语教员美国人饶宾森（亦译鲁宾逊），大钊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就是他保留下来的。他回美国多年后还曾告诉女儿：中国的李大钊是一位伟人，你将来去中国一定要代我到他的故居看看。女儿玛利雅·饶本森1985年来中国时专程到此访问。进入纪念室一见到父亲和大钊在一起的照片，就激动得站不稳脚了，接待的同志赶紧扶住了她，参观后她眼含热泪谈起父亲生前的嘱托。

在一间接待室里，纪念室负责人刘荆山和本村的徐荆璞等几位老人谈起了大钊在故乡

河北省
乐亭县大黑
坨村李大钊
故居



的一些轶事。他们说：大钊青少年时代就刻苦好学，为人耿直热诚，外出读书做事后，假期回乡时，反对迷信、赌博，提倡男人剪辫、女人放足和兴办学校。本村的华严庙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大钊给题写了一副对联：“学校造人才，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为做官。”这学校开始只有男生，后来大钊又帮助成立了女班，取名“华严女校”。

徐荆璞还谈到，目前尚健在的老太太罗国维，常讲她还能记起大钊的样子。说他从外地回来，穿个烟灰色的长袍，黑色马褂。罗国维的父亲是村里的会头，因受大钊的教育影响，热心支持新事物，不让国维缠足，还敲锣宣传放足。

谈到大钊精神现在对家乡的影响，刘荆山说，大钊精神需要深入研究发扬，现在附近胡家坨、麦港、于家寨三乡共同成立了一个李大钊研究会，由三乡文化站站长负责，一季活动一次。中共乐亭县委提出了“学习大钊献身精神，树立大钊故乡意识”的口号。

当时我想，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党内和社会中，奢靡和腐败之风也日益滋长，我们多么需要从大钊精神中吸取民族脊梁之魂魄和共产主义先驱者的正气啊！

这是十多年前的想法，现在我觉得更是这样。

大钊是学者，又是战士。他是一个诚实的为真理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的人。那次访问回来以后，我曾写了一首小诗，献给我故乡的这位伟人。今天也抄在这里：

自信人生有真谛，
摩顶放踵求索之；
深研主义得先觉，
殚精竭虑实行之；
为酬壮志无所惧，
断头洒血以赴之；
道义浩然文章在，
江河不废永吾师。

(林田 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欢迎订阅 2001 年《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若错过了邮局 2001 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 4 日出版，16 开本，内文 80 页，60 克双胶纸；彩封，157 克铜版纸。每期售价 4.80 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东城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010) 64072452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近几年合订本有售

近几年的本刊合订本，尚有少量待售。欲购从速。

1998、1999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6 元，简装每套 51 元。

1996、1997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

均免收挂号邮寄费。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

编辑同志：

最近我常常想到，人生一世总要多一些良师益友才好。

童年有童年时的小朋友，坦诚率真；青年有青年时的朋友，生气勃勃；中年有中年时的朋友，奋发有为；老年当然也有老年时的老朋友，坚定稳重。各个时期又会有各个时期的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以至读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但有多少能称得起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呢？恐怕不会太多。

即使是有不少良师益友吧，他们终究不能和你天天聚首，得以时时求益。我以为，各类刊物这时就是需要的了。刊物，不管是高标准考虑还是低标准要求，对读者来说至少应该能起一些良师益友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样的刊物，也不多。倒是有一些刊物，和良师益友完全搭不上界，有的甚至起着狐朋狗友教唆犯的恶劣作用。

不过，自从《炎黄春秋》创刊以来，我却一直是把她当做我的良师益友的。

首先，我感到她是我的良师。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炎黄春秋》传了什么道、授了什么业、解了什么惑呢？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她始终坚持了传“实事求是”之道。长期以来，存在着不敢和不愿直面现实、用假话大话空话自欺欺人，以至制造假象歪曲历史的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吃的亏，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多了，太严重了。《炎黄春秋》在坚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我认为是一贯坚定不移的。这不但表现在她发表了不少出自亲历者、目睹者、认真的研究者之手的拂去历史迷雾揭示事实真相的文章，而且一旦发现其中又有不实之处的时候，也不惮于修正、更正以至支持争鸣。对现实要讲实事求是，对历史更要讲实事求是；对别人讲实事求是，对自己也要讲实事求是。《炎黄春秋》“传”的就是这个实事求是的“道”！当然这也要有点顶住某些压力和干扰的魄力。

其次，我认为她“授”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业”。历史是不能割断也绝对不应忘记的。一切企图伪造历史、曲解历史、抹杀历史、千方百计使人们忘记

历史者，对今天，对将来，对子孙后代，都将为害无穷。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一无例外地强调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和学习历史的极端必要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大家都懂。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了。明明前车覆了，后车不以为戒，继续上演接着覆车的悲剧。至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则不但不为一般老百姓所关注，一些领导者有时竟然也把这一千古名言抛到九霄云外了，实在太不应该。

我们山东老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历史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唐代杜牧在其名作《阿房宫赋》中谈到秦朝覆灭咎由自取的历史教训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真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炎黄春秋》正是通过她发表的大量文章，给我们上历史课，授这个“历史”之业。

至于“解惑”，《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力求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也就为我们“解”了不少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非难分、皂白莫辨、含混不清、疑窦丛生的“惑”，这正是为众多读者所称道的。

我以《炎黄春秋》为师，然而她却不是板起面孔说教，道貌岸然、望之俨然，使你感到“师道尊严”的威压和拘束。她只是你的一个朋友，和你平等相处，交换意见。她只是以平直坦率的话语和你讲古论今，如有教益，也在“润物细无声”中。

而且，尽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炎黄春秋》也自有她的不足之处，但我总觉得她的内容是老少咸宜的，她的风格是雅俗共赏的。一卷在手，真如面对童年朋友的坦诚率真，青年朋友的生气勃勃，中年朋友的奋发有为，老年朋友的坚定稳重。我和《炎黄春秋》可以说是老朋友。腊鼓咚咚，岁云暮矣。新的一年即将开始，我祝她健康长寿，同时的确又希望像这样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的身边能够更多一些，更多一些。

专此 谨颂

编安

汪 京

2000年10月

『炎黄鼎』展示活动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高6.6米、重20吨的青铜大鼎“炎黄鼎”耸立在上海世纪公园一号门旁湖畔大幅炎黄二帝巨塑画像一侧，雄伟壮丽，沉稳厚重。

10月28日上午，在世纪公园隆重举行了“炎黄鼎”展示活动揭幕仪式。

出席揭幕仪式的有“炎黄鼎”展示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两院院士、原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另三位组委会名誉主任程思远、汪道涵、龚学平因事未能出席。组委会主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因病未能出席)，出席仪式的还有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张仲礼，特邀顾问舒文，“炎黄鼎”组委会副主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克、龚兆源、严家栋、丁锡满、李伦新、张正奎。

出席揭幕仪式的贵宾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圣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全林，以及市政协、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和各部委、局的负责人。“炎黄鼎”的设计者、青铜器

专家，展示活动组委会副主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青铜器专家黄仁生和“炎黄鼎”铸造单位江西裕丰厂副厂长马竹林也参加了揭幕仪式。

应邀远道而来参加揭幕仪式的还有：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炎黄九鼎工程委员会主任王仁民，大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董雁冰，副秘书长周馨，湖北省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魏国秉。

王克代表陈沂主任宣布展示活动开始并致开幕词。李国豪、张仲礼为“炎黄鼎”揭幕。

岳肖峡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二帝巨塑筹委会向上海人民、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表示感谢。组委会秘书长陈美琴宣读题词和各地贺电。方全林讲话，祝贺“炎黄鼎”展示活动圆满成功。

(摘自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简报》第27期)

代 购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羡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羡林人生漫笔	季羡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19.50	3.00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徐葵 张达南 译	28.0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斯人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百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海丝	朴明朗	28.00	4.00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淳 王才 冯广裕	20.00	3.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南太平洋上的翡翠——新西兰	田方 田钢 陈兰	33.80	4.00
一个老新闻战士经历与思考	田 方	15.00	3.00

代 邮

《李锐其人》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而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才能更看清他“这一个”最早走出“左”的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红墙回忆》红墙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红墙内是共和国领袖的住地。这里，有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有领袖人物的真实人生，有领袖们的感情生活……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 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发来贺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发来贺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程思远出席了会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致开幕词，并发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的论文。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德国的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张芝联、戴逸、金冲及、冯其庸、张岂之、汤一介、丁守和、钱逊、黄心川、刘海年、吴元迈、乐黛云、王锐生、王尧、方立天、张立文、葛荣晋、许启贤、沙莲香、阎纯德、刘梦溪、瞿林东、吴易风、王怀宁、陈映真、董金裕、龚鹏程、尉天骢、黎建球、周昌龙、吴清辉、郭少棠、汤恩佳、沟口雄三、熊玠、墨子刻、艾尔曼、成中英、赵冈、周颖南等100多人出席。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宝光、冯征、杜导正、吴塘、鲁淳，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原副校长杜厚文，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曲润海、副院长呼世安等，也出席了会议。



《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研讨会开幕式



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席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莅会祝贺



费孝通会长致开幕词



季羡林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



任继愈教授在闭幕式上讲话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古往今来名利观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文化奇人张伯驹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五十年后重访志愿军战俘营

ISSN 1003-1170



771003 117002

12 >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 507 定价: 4.80 元